

出版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历史，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当前学习的需要，将分册出版。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目 录

一、时代在前进,斗争不止息	3
二、短命的“洪宪帝制”	9
(一)为帝制开路的专制统一	9
(二)尊孔、复辟和卖国的三位一体	19
(三)自导自演的“洪宪帝制”	33
三、风起云涌的反“洪宪帝制”斗争	42
(一)反尊孔,批判“孔家店”	42
(二)反复辟,推倒“洪宪帝制”	48
四、愚腐的张勋复辟	61
(一)地主阶级的保皇派	62
(二)群魔乱舞	70
(三)袍笏登场的复辟丑剧	88
五、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100

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场严重的帝制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封建买办势力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张勋之流，先后导演了两幕帝制复辟丑剧，向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力进行猖狂的反扑。但是，这种倒转历史车轮的反革命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英勇反击，终于彻底溃灭。

整个斗争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里同时展开。政治上，围绕着是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维护民主共和，还是扼杀辛亥革命、复辟封建帝制的激烈斗争。而在思想领域里，则继续伴随着尊法反孔同尊孔反法两种思潮的斗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复辟派不仅抬出孔学作为反动思想武器，而且又总是把尊孔和崇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顽固地推行一条尊孔、卖国、复辟的反动路线。革命势力针锋相对，坚持一条反孔、爱国、革命的进步路线，使斗争呈现出新的特点。

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弄清帝制复辟集团的社

会基础,揭露袁世凯、张勋之流的帝制复辟的反革命手法,彻底批判尊孔崇洋的反动思潮,总结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这对于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时代在前进，斗争不止息

辛亥革命后帝制复辟和反复辟斗争，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历史阶段中展开的。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国家丧失独立，人民没有民主，中国的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①中国一步更深一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谋独立，求民主，打倒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秩序，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作了准备。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创举。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在政治上，颁布《临时约法》，

^①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94页。

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的原则，宣告了王权至上的君主专制统治的终结。在文化思想上，反对尊孔读经。规定学校不拜孔老二，废除祀孔典礼，取消中小学读经课程，不少地方将孔庙改建为学校，没收“孔家店”的田产充作办学经费。辛亥革命反映了人民的革命意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它赶跑了皇帝，冲击了孔老二，这样，皇帝和圣人就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物了，革命的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开来。

可是，辛亥革命很快就失败了。“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的软弱，对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妥协退让，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取得真正的胜利。“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②中国革命的历史，以急速的步伐，开始向崭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① 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8页。

②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41页。

革命阶段过渡。伟大的无产阶级，到五四运动前夕，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二百多万人的强大队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①广大农民阶级反压迫、反剥削、反独裁、反帝制的革命斗争，更是如火如荼，此伏彼起，一天也没有中断过。工农的不断壮大和革命斗争的不断兴起，成为反对袁世凯、张勋帝制复辟的主要力量。

辛亥革命的一度胜利，被推翻的没落政治势力是不会甘心的，必然进行猖狂的反扑，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但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丑剧能一度公演，却有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失败，为帝制复辟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历史上，凡是新兴的、革命的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对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实行革命的专政，这是战胜敌人、保护自己的法宝。谁不坚持这个革命法则，“**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②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巩固政

①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2页。

② 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7页。

权，对内外阶级敌人实行革命的专政。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的武力恫吓和政治欺骗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政不到三个月，就将政权交给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结果，共和民国的招牌保留了，实际上却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制统治；皇帝打倒了，故宫里却依然保存着一个封建小朝廷，享受着袁世凯政府的种种优待；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扯起来了，孔老二的牌位仍旧在很多地方供奉着。总之，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封建土地制度的根基，更没有铲除产生皇帝的社会基础，封建顽固势力逍遥法外，随时随地都可以卷土重来。“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革命党人对于阶级敌人的“文明”和“慈悲”，终于葬送了自己的革命事业，为帝制复辟大开绿灯。

鲁迅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悲愤地说：“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

域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生命。”^①对于这段放弃革命专政而使革命遭致失败的历史，总结得何等深刻！

“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②袁世凯虽然窃取了民国大总统的最高权位，清朝皇帝也保留了最高尊号，但他们不以此为满足，不允许中国社会有微少的改革，甚至连民国的一块空招牌也不允许它存在。他们怀着对革命的刻骨仇恨，进行反攻倒算和帝制复辟阴谋活动，妄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封建君主专制时代。

民国初年的帝制复辟活动，从一开始就分为两个集团。一个是以袁世凯为头子、以帝制自为为宗旨的军阀官僚集团，其特点是具有较大的买办性，而且爬上了最高的统治地位，大多采用“合法”的手段，在帝制复辟活动中表现得更为贪婪，更为两面派。一个是以张勋为魁首、以清朝复辟为宗旨的旧贵族旧官僚集团，其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并且其中的大多数人在革命浪潮冲击下失去了统治地位，大多采用非法的手段，表

①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一卷。

②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现得更为阴狠、更为愚顽。这两个复辟集团由于拥戴的主子不同，出现过一些狗咬狗的争斗，但在仇视人民革命，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帝制复辟这个根本问题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相互利用，分头策划，相继演出了一九一五年的“洪宪帝制”和一九一七年的“张勋复辟”两幕短命的帝制复辟丑剧。但是这种违背人民意愿、抗拒时代潮流的复辟活动，终将被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碾得粉碎。

二、短命的“洪宪帝制”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距离孙中山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才七十天，从武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算起还不到半年，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大野心家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支持下，逼迫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交出政权，当上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他集权专制，尊孔崇洋，开始了帝制复辟的反革命事业。经过几年的经营，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自导自演的“洪宪帝制”开场，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绞索，被革命人民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一)为帝制开路的专制统一

“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①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交出政权而遭

^① 恩格斯：《工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4页。

到失败，但它打倒了皇帝，剥夺了至高无上的王权，保留了一些民主权利。因此，复辟封建王权和维护民主权利，成为当时帝制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中心。但是，要复辟王权，总是首先从镇压人民革命、反攻倒算开始，即把在革命中失去的权力，全部收回去。从反革命起家的袁世凯深深知道，反攻倒算愈彻底，反革命的政治权力愈集中，王权的复辟就愈有希望。因此，袁世凯一上台，就以镇压革命为己任，实行专制的统一，把失去的权力，全部倒算回去，为帝制复辟开辟道路。

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虽然遭到严重削弱，但他们还控制了好几省地盘，拥有十几万革命武装。同时，还留下了一个象征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会，颁布过一部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具有宪法权力的《临时约法》。所有这些，都是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革命成果，它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防范君主专制，成为帝制复辟的严重障碍。

袁世凯耿耿于怀，决心拔去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他凭借窃据国家头目的合法地位，打出孙中山曾提出过的“统一”的旗号，高喊什么“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政权”、“统一国权”、“统一行政”、“统一制度”、“统一民国”，连学校也要“取服从主义”，“统一”于

“尊孔读经”。袁世凯就这样今天一个“军令”，明天一个“政令”，把军、政、财、文等等大权，全部“统一”到他手上，辛亥革命所争得的一些东西，统统被他倒算回去。

袁世凯的集权，是从“统一”军权开刀的。有军则有权，这是反动军阀的信条，在军权问题上，他更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因此，袁世凯一登台后，便三令五申，强调“服从命令为军人之第一要义”。^①规定“军人不得私组政团”，“不准干预政治”，^②否则，就要严加“取缔”，按法“惩办”。他还以“军队复杂”为借口，下令“实行收束”。^③所有这些都是为收缴革命派军权而发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革命党人把军权全部交出来，既不要到军队里发展革命党，更不能干预他的专制集权。这实际上是向革命党人发的逼降令、宣战令。在“统一令”下，袁世凯挥舞屠刀，大砍大杀，仅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湖北，就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残杀了二千多革命党人和革命将士。一九一三年，他又以刺杀宋教仁为突破口，挑动内战，向革命党人实行全面的进攻。

宋教仁是个典型的“议会迷”，醉心“政党政治”。

① 《布告军界文》，《书牍汇编》。

② 《致南京留守黄兴函》、《复王芝祥军统函》，均见《书牍汇编》。

③ 《莅参议院宣言》，《书牍汇编》。

一九一二年，他以同盟会为基础，拉拢其他几个小党组织了一个国民党，幻想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席位，组织责任内阁，以分袁世凯的权力，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国民党在政治上比同盟会大为倒退，完全失去革命色彩，脱离人民群众，充分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在宋教仁四出奔走，到处拉人入党的努力下，国民党在议会中取得了大多数议席，成为第一大党。宋教仁欢喜若狂，满以为可以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出组“责任内阁”，当上内阁总理了。但是，寸权不让的袁世凯，一心想搞集权于一身的总统制，那能容许宋教仁这个“议会迷”组织什么责任内阁，分享他的权力呢？一个卑鄙无耻的暗杀阴谋酝酿就绪，他特务四布，专等宋教仁露面了。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兴冲冲地准备进京活动，结果在上海车站惨遭暗杀。宋教仁被刺以后，袁世凯玩弄了一套贼喊捉贼的把戏，电令江苏都督和民政长，“穷究主名”。但“穷究”的结果，主犯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直接布置暗杀的是袁的心腹、内阁总理赵秉钧。

宋教仁被刺，暴露了袁世凯消灭异己、集权专制的嘴脸。全国大哗，纷纷声讨。袁世凯全然不顾，反以“宋案”为契机，发动内战，把枪口对准革命势力。他发布秘密动员令，把大批兵力调到南京、九江一带，随即

发表《传语国民党人》的最后通牒，公开辱骂和威胁孙中山等人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①并且下令免去江西、安徽、广东三省都督的职务，收缴国民党的军权。

袁世凯的“武力统一”，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立即贷给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巨款，作为反革命的军费，美国则带头承认袁世凯的反动政权，从政治上给予支持。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②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跟在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拥护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叫嚷革命“可恨”，^③“遣散军队，岂容过缓”，^④要袁世凯尽速收缴革命派的军权，将革命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②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3页。

③ 《张謇致赵凤昌》。

④ 《张謇电王饶生》。

势力打下去。清朝复辟集团也想假袁世凯之手削弱革命势力，乘机复辟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因而也积极配合。暂时依附袁世凯的张勋，争先报名，统率“辫子军”主攻南京，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派。

当孙中山被迫组织“讨袁军”、发动“二次革命”进行反抗时，袁世凯公然发布《讨伐令》，攻击革命派是“乱党”、是“叛兵”、是“暴徒”，罪名都是所谓“反对中央”，“破坏民国之统一”。因此，他要为保卫他的“统治权”，而“荡平内乱”。^①

在袁世凯的武力镇压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革命派所控制的七、八省地盘，全部为北洋军阀所吞并，十几万军队消灭殆尽，革命派掌握的地方权力全部丧失。整个中国成了袁世凯的“家天下”。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以后，继续打出“统一”的破旗，全力对付国会和《临时约法》。

国会和《临时约法》，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标志。国会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制订法律，选举总统。《临时约法》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根本大法，它规定了资产阶级的法权，维护资本主义所有制。虽然国会和约法都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的遮羞布，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和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新的政治制度，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软弱的资产阶级在交出政权的时候，幻想依恃国会和约法，维护自己还掌握的一点权力。袁世凯是善于玩弄反革命权术的政治投机商，在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他的情况下，采取“钻进肝脏”、顺着你来的战术，利用国会和约法，窃取国家大权。他今天一个通电，明天一个宣言，高唱“共和为最良国体”，许下将“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①的诺言。还一再宣誓，“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约法”，^②“效忠民国”。袁世凯信誓旦旦，用歌颂民主共和的“靡靡之音”来欺骗和愚弄革命党人。软弱的革命党人果然受骗上当，选他当了临时大总统，交出了政权。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立刻“实行唯一最高政府之集权”。他接受进步党魁梁启超的“挟国会以令天下”的建议，玩弄孔孟之道的“正名”说，利用进步党和公民党的势力，逼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十月六日选举这一天，袁世凯派出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将国会团团围困，高喊：“不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② 《莅临时大总统任誓词》，《书牍汇编》。

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休想出院”。可怜议员们忍饥挨饿，连选三次，最后还是屈服于袁世凯的淫威之下，把他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

袁世凯当上“合法”的大总统后，国会对他已毫无用处，于是转而向国会开刀。在他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职时，宣言要为集权专制而“修明法度，整饬纪纲”。随即攻击国会是“暴民专制”，^①胡说什么国会继续存在，“政权无由集中”。政权不集中到袁世凯手里，就会“贻害全国”，“转至乱亡”。因此，“议会政治，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②

为了消灭国会，借口国民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牵连，犯有“乱国残民”、“破坏统一”的弥天“大罪”，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取消议员资格，把四百多名国民党议员和已经脱离国民党的议员，统统赶出国会，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和行使职权。一九一四年一月，正式下令解散国会。二月，又“一律解散”地方省议会和各级自治会。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从中央到地方全遭扼杀。

与此同时，又授意修改《临时约法》，建立新的造法机构“约法会议”。袁世凯赤膊上阵，亲临开幕式，提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② 同上。

出《增修大纲》，发布增修“宗旨”。在开幕式上，袁世凯破口大骂《临时约法》“束缚政府”的手脚，使得他“身受其苦痛”“二年于兹矣”。他还摆出“我即人民”的臭架势，恬不知耻地说，我一个人“受苦痛”，也就是全国四万万同胞“受苦痛”。高喊“改弦更张”，造出袁记约法，赋予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乃是当前的最大“急务”。^①他还把“力谋国权之统一”^②作为增修约法的“宗旨”，要求因袭孔孟的“定于一”，恢复集权统治。在《增修大纲》里进一步要求赋予他全部大权，取消责任内阁，把国会当作总统的咨询机构，这充分暴露了袁世凯集权专制的面目。

一九一四年五月，约法会议按照“隆大总统之权”的原则炮制出《中华民国约法》，并予以公布。它挂的是民国的招牌，贩卖的却是专制的黑货。袁记约法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享有外交、财政、军事、制订宪法、制订官规官制、任免官员等一切大权。在随后制订的《总统选举法》中，把总统的任期扩大到十年，而且可以连任；总统继任人由现总统推荐，名字写在“嘉禾金筒”的纸上，藏于金柜密室，选举时拿出来唱和一下就行了。根据这些规定，袁世凯不仅成了终身总统，而且

① 《约法会议开颂词》，《书牍汇编》。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可以传子传孙，世袭罔替。正如毛主席所说：“**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①

在袁记约法公布的当天，马上设立“政事堂”，废除内阁总理制的国务院。政事堂隶属于总统府，以“国务卿”为首脑，下设“左丞”、“右丞”。政事堂实际上就是前清时代辅佐皇帝办事的“军机处”，“国务卿”则相当于“宰相”的地位。当时人称国务卿徐世昌为“徐相国”，绝非偶然。随后，又改称地方都督为“将军”、民政长为“巡按使”，还把文官分为上卿、中卿、下卿九等。封建时代的官名、官阶，相继恢复。在这股复古倒退妖风下，有的地方甚至传人用令箭，求见递手本、履历，官员坐绿呢大轿，高撑“万民伞”。

至此，袁世凯已经集中全部权力，扫除了政治障碍，为帝制复辟铺平了道路。只要摘掉“民国”这块招牌，帝制时代即可复现。

列宁指出：“**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② 民族资产阶级交出政权，幻想通过一个国会和一纸约法，和袁世凯共同分享权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4页。

^② 列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页。

力,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也没有捞着。这就告诉我们:历史上任何一个新兴的、进步的阶级,为要实现社会的变革,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掌握政权,**“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①不断地消灭反动派赖以复辟的社会基础。

(二) 尊孔、复辟和卖国的三位一体

袁世凯在实现专制统一的同时,又祭起尊孔、崇洋的法宝,掀起复古卖国的反动逆流。

在历史上,**“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②要制造反革命舆论,就必然尊孔。孔老二是复辟的祖师爷,孔孟之道是反动阶级的思想理论基础。袁世凯和一切复辟派一样,抬出孔孟之道,作为帝制复辟的思想理论武器。

近代中国又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封建买办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资产阶级

^①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②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九期。

的附庸，“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①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袁世凯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崇洋卖国，甘当帝国主义的儿皇帝。

一头匍伏在孔老二的灵前，一头拜倒在洋主子的脚下，既是“孔圣人”的门徒，又是洋大人的走狗，尊孔崇洋，一身二任，这就是近代复辟派的典型特征，在袁世凯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袁世凯一上台，大肆提倡尊孔读经，狂热吹捧孔老二是什么“圣哲”、“至圣”，是什么“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颂扬孔孟之道是什么“圣道”、“圣学”，是什么“撷道德之精，立人伦之极，渊泉溥博，霁被无垠”。^②胡说是“放之四海而准”、^③是世上“莫与比伦”的“真理”^④。把孔老二抬到了吓人的新高度。

为了恢复孔老二“统于一尊”的教主地位，袁世凯发布无数“通令”，网罗各方面的力量，演出一幕幕的尊孔闹剧。

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夺临时大总统职位不久，即

① 毛主席：《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32页。

②④ 《圣哲后裔仍旧膺受前代荣典通令》，程清《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刊》。

③ 《通令尊崇孔圣文》，《书牋汇编》。

指使“教育会议”作出“祀孔”决议。

一九一三年六月，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要求“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①十一月，配合孔教会的尊孔活动，指使“宪法委员会”提出“以孔教为国教”的反动提案，妄图订入宪法，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重新确立孔教的独尊地位。

一九一四年一月，御用机构“政治会议”秉承袁世凯的意旨，通过“祀孔案”，规定祀孔与祭天一样“仍从大祀”，恢复跪拜礼节。二月，袁世凯抛出“祭孔令”，通令全国恢复祀孔典礼，规定“夏正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京师由大总统主祭，各地由地方官主祭，学校则在每年开学之日和孔丘生日自行致祭。同时下令各地“规复文庙”，设官管理。袁氏政府财政部专门拨出款项，袁世凯也慷慨解囊“捐银”五千，在北京大兴土木，将孔庙修缮一新。

孔老二“时兴”了，他的后代也跟着荣华富贵起来。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先后两次发布《崇圣典例》，规定孔孟后裔仍旧享受前代所赐予的一切“荣典”，“祀田租税”仍由孔府“自行征收”。遭到冲击或没收的孔府田

① 《通令尊崇孔圣文》，《书牍汇编》。

产,原封不动地被倒算回去。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特意命令各地方官“妥为保护”。袁世凯这个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考虑得多么周到。

九月二十五日,在《祭圣告令》中大张旗鼓地宣布,规定二十八日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祀孔典礼,用以“尊崇至圣”,“治进大同”。就是说,借助孔老二这个精神偶像,敲开帝制大门。九月二十八日这一天,袁世凯身穿“离奇的衣冠”,亲率百官,来到文庙,大行三跪九叩首,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次声势赫赫的祀孔大丑剧。各地也如法炮制,吹吹打打,煞是热闹。

一九一五年,通令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叫嚷“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把“尊孔尚孟”列为“教育要旨”。袁氏政府教育部颁布种种《校令》,具体规定增开“读经”课程,指明讲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书。

袁世凯通过合法地位大造尊孔声势,同时还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借用“孔教会”的力量,充当帝制复辟的吹鼓手。

孔教会是从属于张勋复辟势力的尊孔复辟社团,它以“昌明孔教”为宗旨,鼓吹尊孔复古,主张清王朝帝制复辟,袁世凯多方笼络,一心想把它引入自己的怀抱。

一九一二年十月，孔教会一成立，袁氏政府就拍手叫好，“准予立案”。称赞说：“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所请立案之处，自应照准。”^①并且命令各地切实加以“保护”。^②袁世凯还特聘孔教会头目陈焕章为“总统顾问”，并且把孔教总会从上海迁入北京。

当孔教会向民主共和发动猖狂进攻，掀起要求“以孔教为国教”的妖风时，袁世凯不仅指使“宪法委员会”提出反动提案，妄图订入宪法，而且还由他的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出面，叫嚷要在宪法上“特著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主张把全国的尊孔分子收罗起来，“总括为一团体，由国家公认而保护之”。^③积极为孔教会张目。但是，这些反动主张，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被否决。

一九一三年秋，孔教会在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举行大规模的祀孔典礼。袁世凯明令对赴会的孔教会分子、遗老遗少，一律“核减车价”，给予半价乘车

① 《教育部批》《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1号。

② 《内务部为保护孔教会复大总统府秘书厅函》《政府公报》第708号。

③ 《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7号。

的“特别优待”。此后又派心腹梁士诒为总统代表，多次参加孔教会在北京举行的祀孔活动，有贺长雄和另一个洋“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也亲临“致祭”，使孔教会大增“荣光”。

但是，孔教会的发起人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等以及它的幕后指挥者康有为都是辛亥革命前的主要保皇派，他们鼓吹尊孔，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清王朝。在尊孔这一点，袁世凯和孔教会可相互利用，但在帝制复辟上，却各不相同，因此，袁世凯对孔教会是有戒心的。一九一三年四月，他命徐琪出面组织孔社，以徐世昌为名誉社长，作为御用工具。孔社以“通经致用”、“巩固国基”^①为宗旨，反对孔教会尊孔复清。所谓“通经致用”、“巩固国基”，实际上就是拥袁自立为帝。袁世凯在祝词中表示，以孔教为“宗教”，“既失尊孔本意，反使人得执约法以相绳，何其僭也”。煽动反动文人“自由阐发”孔教微言大义，实现“国体日固，孔学日昌”^②的目的。这就是说，要为袁世凯当皇帝“阐发”理论根据。孔社由于袁世凯的“尊崇提倡”，更是热闹。又是设立什么“博闻”图书馆，又是成立“信古传习所”，发行《孔社杂志》，还在八月间大肆筹备孔老二的“诞日纪念

① 《孔社答词》，《孔社杂志》，第一期。

② 《致孔社祝词》，《孔社杂志》，第一期。

会”。所有这些活动袁世凯都派代表参加，代为致词，又“厚助”三千元。在纪念会上，自吹有数万人参加，吹吹打打了四天才收场，也是当时少有的闹剧。由于孔社是“官办”的尊孔团体，因此，他们不把孔教会放在眼里，扬言“孔学之发达，自应以本社为权舆”，^①表现得十分猖狂。孔社成立后，各地相继建立分社，成为全国性的、由袁世凯直接操纵的御用工具。

在孔社成立前后，其他军阀的重要头目也在各地控制了一些尊孔团体，如冯国璋当上了济南孔道会名誉会长，黎元洪支持上海的“寰球尊孔总教会”，阎锡山支持山西的“宗圣会”。这些团体与袁世凯相配合，都想借助孔老二的力量，通向高官厚禄之道。

鲁迅在揭露袁世凯尊孔复古时说：“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②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告诉我们，当有人为孔老二扬幡招魂、歌功颂德的时候，当孔庙里香烟缭绕、古乐喧天的时候，人们就要警惕，反动派已经在借尸还魂，准备复辟了，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① 《孔社答词》，《孔社杂志》，第一期。

②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为了“洪宪帝制”早日登场，袁世凯又跪倒在帝国主义脚下，投降卖国，乞求主子的支助。这个大卖国贼声言“敦睦”（即卖国）是对外政策“唯一之基础”。^①他一再声明“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甚至未曾立约，只要已经“成例”，也一一照旧承认。^②为了得到主子的“垂青”，又以中国的大好河山为贡品，毕躬毕敬地向主子敬献。据不完全统计，在袁氏当政的几年时间里，先后和俄、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过一百个以上的不平等条约，大肆拍卖国家主权。一九一五年五月，又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规定中国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全部划归日本控制，并赋予政治、财政、军事、警政等各个方面的特权。这是一个由日本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最大卖国条约。

袁世凯的卖国，得到主子的赞赏。帝国主义回过头来大力支持奴才复辟。

在袁世凯实行专制的统一、镇压“二次革命”时，五国银行团立即送去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巨款，作为镇压革命的军费。

袁世凯要当正式大总统，帝国主义“外交团”立即

① 《答外交团颂词》，《书牍汇编》。

② 《莅参议院宣言》、《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书牍汇编》。

表示：“各国于此举，亦利助成”。^①

在“洪宪帝制”的密锣紧鼓中，帝国主义更是争先恐后，竞相支持，都想在袁世凯身上捞取更大的利益。

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累累传言，“中国应该有皇帝”，完全赞成“改国体”，甚至表示“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内政问题，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当日本迫使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又以赞成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对袁世凯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德皇威廉二世也积极支持，并答应在“财政器械”方面“给以大力援助”。英国唯恐落后，命令驻华公使朱尔典速见袁世凯，申明英国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和美国一道，反对中国实行共和，主张君主立宪。现在又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帝制复辟。美国更为热心，不仅在袁世凯身边安插了古德诺当顾问，公开鼓吹帝制，而且“亟盼”帝制运动“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帮腔说：“治理中国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体”。^②他还上书支持袁世凯“为君主之治”，^③

① 《外交团谒见颂词》，《书牍汇编》。

② 《中国果适用专制独裁乎？》，《尚贤堂纪事》，第六期，第10册。

③ 《节录李佳白博士上大总统书》，《尚贤堂纪事》，第六期，第10册。

当中国的大皇帝。沙皇俄国则在“暗中尽力帮助袁世凯”镇压人民革命，为帝制复辟扫清障碍。

中外反动派在政治上的勾结，同样在文化上反映出来，需要反动文化为卖国、侵华张目。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①在近代中国，这个文化反动同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尊孔为纽带。袁世凯崇洋卖国，要靠孔老二提供理论根据；帝国主义侵华反华，要利用孔孟之道作为思想武器。主奴双双利用，孔教大有妙用。

袁世凯从孔孟之道的“微言大义”里，引伸出一整套卖国理论。

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袁世凯搬出“民无信不立”的反动教条，鼓吹什么“立国首重信用”，^②“对外必当以信”。^③所谓“信”，就是要“恪守”自鸦片战争以来，和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协约、公约和契约，“切实承认”侵略者所掠夺的一切特权。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是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55页。

② 《外交总长报告参议院中日交涉始末情形》，《书牍汇编》。

③ 《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书牍汇编》。

中国丧失民族独立、贫穷落后的祸根。袁世凯维护这些，就是要中国人民听凭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宰割，使中国永无独立之日。他还侈谈什么只有对主子“真心和好”、“以礼往来”才能“巩固国基，争存宇内”。^①这种“礼之用，和为贵”的陈词滥调，无非是要人民忍受侵略，不准反抗，以便于“巩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争”得主子的支持，使反动的袁记“中华帝国”能够迅速“立”将起来。

孔孟之道既为旧的主奴关系辩护，又为新的卖国行径提供理论根据。孔老二的“大同”说教，就成为袁世凯的卖国经。袁世凯说什么“孔子喜言大同”，中国必须向帝国主义“开放”，要“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并美其名曰：“世界主义”。^②在“世界主义”下，袁世凯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帝国主义完全“大同”起来。主子需要什么，奴才就敬献什么，日本发个“最后通牒”，他就消灭“国界”，乖乖地在《二十一条》上划押。《二十一条》几使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袁世凯却称赞这是“双方信好，东亚之福”。^③还打肿脸来充胖子，吹嘘这是“外交

① 《莅参议院宣言》，《书牒汇编》。

② 《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书牒汇编》。

③ 《申令》，见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大胜利”，主张在全国“提灯庆祝”，真不知人间羞耻事。

在尊孔逆流中，帝国主义出于侵华的需要，也以重要的角色参加这场尊孔大合唱。

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大捧特捧孔老二，宣扬孔教是什么“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国家新命之所托”，“各种文明之模范”。^①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吹捧孔老二是什么“中国独一无二之圣者”，孔学是“人类共通之原理”。^②把孔孟之道抬到超越国界的新境地。其他侵略分子也大肆鼓嚷，把“巧伪人”孔老二吹捧为“德隆千圣，道冠百王”的“圣人”，把“吃人”的孔孟之道推崇为“奇伟经典”，^③“中国古有文化之结晶”。

这班侵华急先锋唯恐孔教绝灭，叫嚷要“联合中西各国”，合力“保存国粹”，挽救“东方精神文明”。^④为此，积极配合袁世凯和孔教会的尊孔活动，把孔老二抬上教主的宝座，呼叫“欲保孔教之地位，救孔教于衰微，舍定国教外无他法”。^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机构尚贤

① 《论中国之新命系于孔教》、《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均见《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1号。

② 《孔教之窥见一斑》，《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刊》。

③ 庄士敦：《与孔教会书》，《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刊》。

④ 约翰斯顿：《联合中西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东方杂志》，第九卷，第12号。

⑤ 庄士敦：《中国宗教之将来》，《经世报》，第一卷，第1号。

堂，多次召开教务联合会，组织以“明定孔教为国教必无妨于信教自由”为题的“讨论”，研究挽救孔教之法。这些家伙还一再向袁世凯献策，你要想巩固独裁统治，就“必须尊崇孔教”，“孔教昌则民国愈固”。^① 你要想当皇帝，“首要的问题……就是乞求孔夫子的权威”，从而“达到”你所切望的“一切改革”。^② 帝国主义侵略者刻骨仇恨中国人民革命，告诫袁世凯说：“革命是坏东西，革命的狂热更坏，……制止革命最好的方法就是当它开始时迎头痛击之。”^③ 即用“宗教”的力量消灭革命和革命思潮。只有提倡孔教，才能防止“社会骚动兴起”，^④ 防止“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⑤ 露骨地阐明了孔教遏制革命的功用。袁世凯老早就在主子面前表白过，由于“乏经验”，必须“借用异材，以资先导，而备顾问”。^⑥ 帝国主义“顾问”们，确是没有辜负奴才的期望，为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出谋划策，大造反革命舆论。

但是，尊孔也罢，复辟也罢，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侵华，为了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那个前

① 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尊孔》。

② 盖沙令：《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第2卷。

③ 李佳白：《宗教与革命》。

④ 《记八十二次教务联合会事》、《尚贤堂纪事》，第七期，第10册。

⑤ 盖沙令：《论中国之新命系于孔教》。

⑥ 《莅参议院宣言》，《书牍汇编》。

后在中国呆过四十多年的老牌文化特务、侵华老手李佳白，后来总结反革命经验说：“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能使华人反教仇外之趋向渐次消灭，且以得着中国许多有势力之朋友。”^①孔教可以“消灭”革命，培植帝国主义傀儡，维护殖民统治利益，妙不可言。日本政客犬养毅公开招认，孔教“振兴”，“不独中国得其利，东亚与世界亦必蒙其益”。^②德国侵略分子费希礼对于孔教“有功效于将来，……有功效于世界”的“深仁厚泽”，狂喜得莫可名状，他欢呼说：“呜呼！此等根深蒂固之树木，其所结之果，熟而且美，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吾人安可不细心研究之。”^③这些招供，一一揭开了尊孔侵华的老底。孔学有这样大的妙用，无怪乎“笃志”孔孟之道的“洋儒”们愈来愈多。为了使孔教的香火一代一代传下去，日本在国内提倡读经，德国皇帝下令学校“增入孔教”。^④他们都在“细心研究”，妄图利用孔老二这块“敲门砖”，进一步打开中国之门。

中外反动派的尊孔大合唱说明：复辟必尊孔，卖国

① 《李佳白博士重述其对于中国之友谊计划》，《国际公报》，第五卷，第45、46号合刊。

② 《童子读经尤贵实践道德》，《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刊》。

③ 《孔教论序》，《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刊》。

④ 《记德国名汉学家卫礼贤博士》，《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刊》。

必尊孔，侵华必尊孔，它们都以孔孟之道为媒介，死死地纠合在一起。尊孔有利于侵华，有利于复辟，主奴各得其利，这就是袁世凯和帝国主义联合尊孔的根本所在。同时，在袁世凯身上表现出来的尊孔、复辟和卖国的三位一体，证明尊孔与崇洋是实现“洪宪帝制”的两件法宝。

(三) 自导自演的“洪宪帝制”

袁世凯经过几年的准备，在政治上镇压了革命势力，思想上复活了孔老二，组织上纠合了复辟党，国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国内有地主买办阶级作社会基础。他踌躇满志，自命不凡，大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之概。袁世凯越发猖狂起来了，复辟帝制的政治野心，对皇帝宝座的贪婪性，更为露骨地表现出来，他想在一天之内就摘下“民国”这块空招牌，建立封建的袁氏王朝。于是，自导自演的洪宪帝制丑剧，正式开场演出。

一九一五年八月，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抛出《共和与君主论》的黑文。古德诺以所谓“总结”中外历史经验为名，歪曲历史，借古讽今，诬蔑中国民智低下，没有能力实行共和，鼓吹只有“保存君位”，实行

君宪，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断无善果”。^①日本顾问有贺长雄紧密配合，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一书，除重复古德诺的谬论外，还进一步指明必须集权于袁世凯一身，由袁世凯出来当皇帝。顾问双双出马，奴才受宠若惊，袁世凯高兴得拿着古德诺的“大作”，到处赠人。

《共和与君主论》等文的发表是一个黑色信号，标志着洪宪帝制已经进入公演阶段。袁氏党徒引为“金科玉律”，到处招摇撞骗，帝制复辟的狂风恶浪，猖獗泛滥。

时隔几天，以杨度为首的几条汉子，在袁世凯驱使下，公然“出头”组织“筹安会”。它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为幌子，大肆发挥古德诺“君主实较民主为优”的复辟谬论，积极为袁世凯筹“定于一统”、“长治久安”之策。筹安会公推孔老二第七十六代孙孔令贻为“名誉理事”，孔令贻则派出“代表”参与该会的一切活动，双方狼狈为奸，充分暴露了筹安会的反动性。

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为袁世凯称帝制订了“定于一”的反动政治纲领。在这篇又臭又长的黑文中，露骨鼓吹“去共和”，“求君主”，请袁世凯出来当皇帝。胡说什么“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此）所谓定于一也”。这种“定于一”的黑货，是从“亚圣”孟轲那里贩来的，目的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是要恢复“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复辟君主专制，让袁世凯能“名正言顺”地去当皇帝。

杨度之流所宣扬的帝制舆论，当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纷纷要求取缔筹安会，诛杀杨度等帝制犯。袁世凯玩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手法，公开为他们开脱罪责，说什么筹安会系“绩学之士”的“自由研究”机关，“政府未便干涉”。^①他还赌咒发誓，表示自己和帝制活动没有关系，甚至立下“保证书”说：“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如果有人逼我做皇帝，我就离开中国，到英国伦敦当隐士，“从此不再过问政事”。^②你看！说得何等动听，又是何等超然。可是，还是这个袁世凯，却赞叹杨度是什么“旷世逸才”，同时派出大批的荷枪实弹的军警，对筹安会和杨度等人的住宅严加保护，又给予巨额的活动经费。筹安会到底为谁家“筹安”，又是为谁家所豢养，不是十分清楚，不言自明吗！

经过筹安会的一番鼓噪，袁世凯紧接导演了一场制造“民意”和所谓的“劝进”的丑剧，千方百计地要在皇冠上抹上一层“君为民举”的灵光，把自己打扮成为“人民”的化身、“代天行道”的“圣君”。这是历史上一切野心家、阴谋家在反革命复辟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② 《申报》一九一五年八月十七日、七月九日。

政治特点，“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①

为了制造民意，筹安会拼凑所谓的“公民请愿团”，于九月一日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变更国体”。袁世凯特派“左丞”杨士琦前往助威，暗示机宜。在其代表袁世凯发表的“宣言”中，一方面假惺惺地说：“维持共和国体”，是大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现在大家要求变更国体，“似难相容”。接着，话锋一转，“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只要“征求”到“多数国民之公意”，求得“妥善之上法”，我袁某自然可以“俯顺民情”，变更国体，去登金銮宝座。^②

主子令下，奴才紧跟。刹那间，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商界学界请愿团……象粪坑里的蛆虫一样，在全国各个阴暗的角落里爬上地面来。他们在袁世凯这堆臭狗屎身上爬来爬去，翻腾得好不热闹，一定要“扒”出一个皇帝来。这娼妓、乞丐的“民意”，正是袁世凯反动政治的真实暴露。一些“喁喁望治”的孔教门徒，也纷纷爬出来献媚，直隶、河南两省的孔社，分别上书请愿，请“早定君主立宪”，“复尊君亲上之本”。^③帝国主义分

① 毛主席：《〈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③ 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第一册。

子也纷纷上书，支持袁世凯“为君主之治”。

在此期间，袁世凯的另一走卒梁士诒成立所谓的“全国请愿联合会”，秉承袁氏“依法举办”的意向，在参议院门前吵吵嚷嚷，“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依照“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精神，迅速把袁世凯“公选”出来。

看看袁世凯的“法简时短”、“依法举办”的两面派把戏吧！

“国民代表”名义上由各县选举产生，但在给各县知事的密电中却规定，必须选择“性情纯和，宗旨一贯，能就我范围者”；代表到省集中后，又指示设“招待员”进行“疏通”，搞特务式的攻心战，“嘱以必赞成帝制，必举袁世凯为帝”；地方官则借“谈话”或“宴会”的形式，大讲“君宪要旨”，“密示”当选名单。总之，务必“设法指挥，妥为支配”。对“宗旨不合”的代表，则采取“无形之强制”，“消灭……各种‘危险之真意’”，以保证袁世凯百分之百地当选。“国民代表大会”从成立到各省选出代表，前后仅仅化了二十来天的时间。这就是他的“法简时短”，对法律进行了无耻嘲弄。

代表产生以后，又规定所有“请愿书”、“推戴电”、“劝进书”等等，统由“国民会议”事先“预拟备用”，各省各团体只在上面签名画押。在“推戴电”中“谨以国民

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更改”。袁世凯贪婪帝位，却说成是“国民公意”，这是典型的强奸民意，无耻至极。

十月底，开始“国体投票”。投票结果，全国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代表，赞成君主立宪政体的不多不少，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票，袁世凯创造了世界少有的“大胜利”。可是，假的就是假的，这“胜利”怎能掩盖得了“洪宪帝制”的黑暗和腐败。当时《申报》有一则报导，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选举的真相：“投票之日，军署自大门以至投票处，军警夹道，背枪荷戈。各代表于刀枪林立之中，鱼贯而入，其心已不能无惧。及入场，所谓将军者，又戎服登坛，慷慨以谈帝制之有利于中国；投票纸上又仅‘君主立宪’字样，并非谓帝制与共和并列，此反对二字，遂愈觉下笔为难矣。投票已毕，即有职员捧出预定之推戴书，各代表哄然聚观，职员又厉声谓，诸君何必纷扰，一言以蔽之，举袁世凯为皇帝而已，为时已晚，望诸君从速签名，不然者，恐今日将不得出门矣。诸代表无法，遂一一遵教，到底未尝知推戴书中如何措词也。签名既毕，又有职员发起高唱‘大皇帝万岁’三声，然当时众志成城，声口不一，竟有误呼‘中华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者。职员大怒，谓这回不算，卒另选六、七人

于室隅，重唱‘大皇帝万岁’三声而罢。”引文虽长，但真实，生动，深刻。这是对所谓“尊重法律”和“顺从民意”的绝妙讽刺。

到此，戏还没有唱完。投票以后，连气都来不及喘一下，各个省区马上拿着“国民会议”预拟好的四十五字“推戴书”，纷纷“劝进”。袁世凯还嫌不够，又由参政院代表“全国代表大会”上“总推戴书”。孔府大恶霸孔令贻也钻出来为袁世凯捧场。他不仅用个人名义上“劝进书”，夸奖帝制复辟是“守先圣尊王之意”，恭请袁世凯“俯顺輿情，允国民之推戴，仰承天命，建皇极之谟猷。”^①而且还伙同孔、颜、曾、孟四姓“奉祀官”，吹捧袁世凯是什么“神圣文武，天与人归”，要求袁世凯“早正帝位”。^②后来，他还口口声声称“皇帝陛下”，表示登极之日孔府将“提灯庆祝”，“悬彩庆贺”。

袁世凯导演“劝进”，又虚伪地故作“谦让”。他一面退回“推戴书”，说什么民国初建之时，已宣誓拥护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言，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请予“另行推戴”。一面则表示，君主立宪，“民意”所归，“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但是，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君主之位。这又是在做戏，其弦外之

①② 《孔府档案》。

音就是授意为他洗刷背叛民国的罪行，讴歌他的“丰功盛德”，用以欺骗群众。果然，参议院立即开会决定“再劝进”，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第二次推戴书，递送上去。在这一洋洋数千言的“杰作”中，把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反革命两面派袁世凯，吹捧为“功崇德茂”、“迈越百王”的“圣君”；把背叛民国，帝制自为的罪恶，一古脑地推到人民头上。说什么过去信誓旦旦，是顺从民意的“循例之词”，现在当皇帝，则是“以民意为准的”。共和也好、帝制也好，都是国民的意志，跟袁“皇帝渺不相涉”。①颠倒是非，信口雌黄，把袁世凯的滔天罪恶洗刷得一干二净。

双簧演完后，该走的过场已经走了，该办的手续已经办了，现在他要亲手摘下民国这块牌子了。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在“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②的借口下，高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滥调，正式接受推戴，承受帝位，当“中华帝国”的皇帝。十三日，在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随即册封黎元洪等一百二十八人的爵位，加封孔令貽为“郡王”。同时，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为登极大作准备。下令从一九一六年起改为洪宪元年；元旦之日举行登极大典。

①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袁世凯当上皇帝后，气焰嚣张，凶相毕露，把罪恶的矛头进一步指向革命人民，妄想全面地“克己复礼”，把人民踩在脚下。他当皇帝的第一天就恶毒攻击人民是“好乱之徒”，声称要“执法以绳”，^①血腥镇压。随后又发布“申令”，“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懍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②袁世凯这种疯狂劲，十足地反映了没落阶级如何急迫地想在一天之内恢复旧有的全部秩序，妄想随心所欲地摆弄历史。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袁世凯爬上皇帝顶峰之日，正是他粉身碎骨之时。一场反帝制、反复辟的人民斗争，迅速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兴起。八十三天之后，洪宪帝制就彻底垮台了。

①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三、风起云涌的反“洪宪帝制”斗争

袁世凯反攻倒算，倒行逆施，从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的阶梯，爬上皇帝宝座，把自己孤立封建等级制度的宝塔尖顶上。他自以为得计，大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黄粱美梦，妄图使袁家王朝“传之万世”，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但是，“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①袁世凯“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②

(一)反尊孔，批判“孔家店”

当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结成反动联盟，共同抬出孔老二这具僵尸，掀起尊孔复辟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6—697页。

② 毛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

逆流的时候，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他们更高地举起反孔的旗帜，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尊孔倒退，反对尊孔复辟。这是“五四”运动以前，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反孔斗争，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它冲击了地主买办阶级的思想统治，为政治上的反帝制、反复辟造了革命舆论。

革命人民反对袁世凯尊孔的斗争，早在一九一二年即已展开，进步力量“极端反对”袁氏“教育会议”的祀孔决议。一九一三年斗争更形激烈。袁世凯的《通令尊崇孔圣文》一公布，全国大哗，舆论骚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华新报》发表社论，指出：“所谓祀孔子者，不外历代君主为巩固君权之手段”。还一针见血地揭露袁世凯尊孔，只不过是“借祀孔子之名，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复活之实”，其手段比王莽假托周礼篡汉“更妙十倍。”^①他们还在国会中反对以孔教为国教的提案，主张“全案取消”，^②迫使该案无法通过。指出袁世凯尊孔教为国教是“阳为孔教，阴具诡谋”，“鸿门舞剑，意在沛公”。^③再次揭露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险目的。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大搞祭天祀孔，革命派又在

① 均见马大中：《大中华民国史》。

② 《宗圣学报》，第二卷，第6册。

③ 《孔教非宗教论》，《雅言》，第一年，第1期。

《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这是“帝制复活”之“先声”，警告国民提高警惕，否则，不久的将来“总统二字，行将消灭”。^①

“宋案”出现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抛弃幻想，立即走上武装讨袁的革命道路，坚决表示要“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袁世凯，^②在《讨袁檄文》中揭露尊孔丑剧是为了当皇帝，戴王冠，“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明确指出：“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反顾。”^③孙中山等还在海外奔走呼号，揭露袁世凯祭天祀孔的险恶用心，狠狠地打击帝制自为的阴谋活动。

另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也从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中惊醒过来，他和孙中山一道，走上反孔斗争的战场。面对尊孔复辟的反动逆流，章太炎不顾个人安危，于一九一三年只身赶到北京，“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④袁世凯恼羞成怒，当即把章太炎软禁起来，加以严密监视，不准他外出，不准议论时政。在被禁的几年中，章太炎照样议

① 见马大中：《大中华民国史》。

② 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

③ 《讨袁檄文》、《第二次讨袁宣言》，《孙中山选集》。

④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论时政，顽强不屈。他揭露袁世凯之流妄图以孔教为国教，“其心乃别有主张，吾甚非之。”^①他顶住威胁和利诱，不被袁世凯所利用。“往日当事数遣客来伺余意，道及国体，余即以他语乱之，间亦以辞章讽刺”。^②在此期间，他在住宅里开办“国学会”，在国学会门口公开贴出通告：“凡入孔教会者，不准入会”，^③声明国学会与孔教“绝对不能相混”。^④在国学会讲课中，又一次揭露了孔老二及其门徒的丑恶嘴脸，“大抵孔子乃春秋时一政客，其七十子之徒，不过其政党中之党员耳。”^⑤章太炎还辛辣地讽刺袁世凯大演祭天祀孔丑剧，指出这一套不过因袭以往反动统治者的老办法，用以显示自己秉承天命的威严，欺骗“群黎百姓”。但是，时代不同了，再想骗人，也办不到了，这样做“徒可自欺而已”。^⑥

孙中山和章太炎坚持民主革命立场，及时揭露了袁世凯尊孔复辟的险恶用心，鞭挞了复辟祖师爷孔老二。他们大造革命舆论，促进了反袁斗争的新高涨，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① 《章太炎先生家书》。

② 《章太炎先生自撰年谱》，《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③ 《远生遗著》。

④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⑤ 金毓绂：《国学会听讲日记》。

⑥ 《隆礼杀论》，《章太炎先生所著书》，第八册。

一九一五年，当袁世凯积极准备帝制复辟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爆发了。这是一场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提倡“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矛头指向孔孟之道的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大斗争。

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一九一五年九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新青年》。鲁迅和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是斗争中的主要战将。他们发表了大量文章，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尖锐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直接冲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尽管袁世凯在一九一六年死去，但这场反孔、反帝制的思想斗争，一直延续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袁世凯和孔老二始终是这场斗争的靶子和批判对象。

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早在一九一三年，鲁迅就辛辣地嘲弄袁世凯尊孔祀孔的丑剧。他笑骂说：“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①一九一八年，他在《新青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一篇闪烁光

①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鲁迅日记》。

辉的讨孔檄文。鲁迅借“狂人”之口，揭露了血淋淋的阶级压迫的事实，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礼教统治，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撕下封建统治者和孔氏门徒的伪装，告诉人们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实际上都是“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的混世魔王。鲁迅还一再抨击“圣人之徒”的所谓“保存国粹”，他们高喊保古，保古，目的“不过还想吃人”。

面对这“吃人”的黑暗社会，鲁迅仇恨满腔，大声疾呼：“我诅咒吃人的人”，“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号召劳动大众用新的“革命”的方法，冲破“黑暗的闸门”，“除去世上害人的强暴”，“割去”毒瘤毒疮般的“国粹”，推翻那“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万恶社会，求得中国的“完全解放”。^①

鲁迅还深刻揭露了袁世凯这样一些“无耻的中国人”，提倡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罪行。他们既要尊孔，又特别崇洋；既是“圣人之徒”，又是“西哲”“西儒”；中

^① 鲁迅：《随感录》，《鲁迅全集》，第二卷。

外结合，兼而有之。鲁迅说，“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们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①十分深刻地揭露了洋奴腐儒们的面目。袁世凯不就是这么一个既“输入外国文明”，^②又特别提倡尊孔的“新人物”吗！不就是挥舞奴化思想和复古思想的武器，用以收拾人心，为其卖国、复辟的罪恶目的服务吗！对于这种奴化思想和复古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二重思想”，必须把它“连根的拔去”，只有这样，中国才有“进步”。^③鲁迅洞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旧文化的危害，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这种认识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是中国的新文化由旧民主主义的文化，开始向新民主主义文化转化的伟大飞跃。

（二）反复辟，推倒“洪宪帝制”

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以后这一段历史时讲过：

-
- ① 鲁迅，《随感录·四十八》，《鲁迅全集》，第二卷。
 - ② 《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书牍汇编》。
 - ③ 鲁迅，《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二卷。

“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象袁世凯，很蛮悍的军队象张勋，都是终归失败。”^①这集中说明了一个真理，即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袁世凯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终于自取败亡，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劳动人民是反袁的主力军。广大农民始终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高举革命的旗帜，反剥削，反压迫，反独裁，反帝制，自发地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从东北三省到南海之滨，从川陕高原到江淮平原，农民的武装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遍及全国各地。“二次革命”前后，在会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先后在湖北、湖南、云南、广东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倡言“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有力地声援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打得袁世凯天天嚷叫要“恢复秩序”、“除暴安良”，表现出色厉内荏，惶惶不可终日的狼狈相。一九一四年，一场反对清丈田产、验契和增加捐税的斗争，在山东、山西、云南、安徽、奉天、直隶、河南、甘肃、

^①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

江西等省相继出现，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一五年。

与辛亥革命几乎同时爆发的白朗起义，是反袁斗争中规模较大、坚持最久的农民起义。它从河南崛起，驰骋安徽、湖北、陕西、甘肃诸省，部众从几百人很快发展到几万人，坚持了四年之久。白朗起义最初揭出“劫富济贫”的大旗，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改换自己的旗号，以适应斗争的需要。一九一四年，起义军曾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系，改名“公民讨贼军”，提出“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之政府”^①的革命口号。它还不断揭露袁世凯独裁专制、帝制自为的狼子野心，在紫荆关发布的文告中指出：“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②在陕西遍贴布告，进一步揭露说：“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③白朗起义从“劫富济贫”发展到反帝制复辟，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起义军沿途打击“殷商富户”，焚毁教堂，惩罚教士，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

中外反动派对白朗起义恨之入骨，各国驻华公使一再敦促袁世凯加强镇压，“要求迅速扑灭”，对起义军

① 闲云：《白朗起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

② 《北洋政府邮政总局档案》。

③ 《大公报》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实行血腥的“大惩创”。^①一九一四年二月，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专门派出军事人员到信阳“观战”，研究镇压人民的方法，建议“用飞机抛掷炸弹”，甚至提出，如果“中国无此等飞行家，可向外国聘任”。^②在主子的授意和帮助下，袁世凯前后调动八省二十多万反动武装，对起义军前追后堵，实行惨酷的反革命围剿。沙皇俄国则派出飞贼，驾着飞机到处滥炸。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白朗起义于一九一五年最后失败。

当袁世凯大搞政治交易，同日本谈判和最后接受《二十一条》的卖国罪行揭露以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同声伸讨，掀起讨袁抗日的爱国运动。上海日本大阪公司、三井煤栈和其他在华企业中的中国工人，立即散发传单，举行罢工；湖南长沙日资企业的中国工人，也举行集会，宣布罢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讨袁抗日斗争中，以英勇顽强的姿态投入战斗，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北京、汉口、烟台、福州、厦门等地的革命群众，连日举行抗日集会，游行示威，动辄二、三十万人。“爱国抗日同志会”、“劝用国货会”、“救国储金会”、“排斥日货同盟”等爱国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

① 《大公报》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三十日。

② 《大公报》一九一四年三月十日。

地纷纷成立。商人发起抵制日货，举行罢市。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海外奔走呼号。留日学生组织“归国请愿团”，海外侨胞纷纷成立“救亡团”一类的爱国团体，举行集会，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全国各个阶层普遍奋起，奔走呼号，集会演说，刺血上书，断指自誓，报纸尽情登载，传单、宣传刊物散发全国，抗日戏剧也在各地公演，真是“风起云涌”，“全国一致”。举国人民喊出同一个声音：反对侵略，反对卖国，废除卖国条约。揭露袁世凯“乘间潜帝而求助于日本”，“以求帝位”而“甘心卖国”^①的罪行。认识到“袁氏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安”，只有“力行革命”，武装讨袁，除去卖国贼，才能“根本解决”^②问题。英雄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宁为中国鬼，不为日本奴”，决心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到底。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下，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帝制阴谋，迫使《二十一条》无法生效。

袁世凯悍然称帝以后，广大人民怒不可遏，斗争进一步发展。陕西哥老会一军突起，鲜明地提出保护共和、推翻帝制的革命口号，发表讨袁檄文，威震渭水流域。河南人民再度打出白朗的义旗，兴师讨袁。山东、

① 《总理全集》下册，《函札》。

② 《中华革命党通告》，《民谊》。

直隶人民纷起暴动，直接反对“征滇费”、“大典筹备费”、“国民代表选举费”等苛捐杂税，狠狠打击了帝制复辟活动。陕西、四川的革命群众、会党、绿林，亦不断兴起，“乘机响应”。全国士农工商，各界人民，纷电声讨，指出袁世凯是“吾侪之大敌，叛国之元凶”；^①要求“诛除逆贼”袁世凯，“划除”洪宪帝制，立将帝制犯杨度、梁士诒“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在反复辟斗争中，中国人民显示了雄厚的革命力量、强大的革命威力。正是在人民的铁拳下，洪宪帝制遭到彻底失败。

在人民革命的推动和鼓舞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制复辟的斗争。

一九一三年七月，为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一和武力镇压，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七月十二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孙中山的命令下，组织“讨袁军”，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在檄文中历数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

① 《十九省公民书》，《袁氏盗国记》。

②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32页。

款，……以兵威劫天下”的罪行，号召国民“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江苏、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也相继响应。一时“民气澎湃，不可遏抑”，^①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武装反抗，声势大振，坚持达两月之久。有力地冲击了袁世凯的专制统治。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的要人，垂头丧气，奔逃海外，缄口不言革命。唯有孙中山百折不回，志不稍衰。“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②表明孙中山的政治认识，已有显著提高。为了集结革命力量，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宗旨，坚持武装讨袁的革命道路。随后又派出大批党员，前往上海、华南、华中、东北各地区，深入十几个省份，从事联络军队，策动武力反袁。孙中山不断揭露帝制阴谋，指出袁世凯“急于制其王冠”，“旦夕将称帝”，指斥筹安会“盛倡帝制”，鸣锣开道的罪恶活动。“洪宪帝制”丑剧揭幕以后，孙中山先后发表《讨袁檄文》和《讨袁宣言》，历数“独夫民贼”袁世凯窃国、称帝的罪恶，“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隶牛马之时”。

① 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

② 《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上卷。

坚决表示，为了维护民主共和，“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表现出和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可贵革命精神。他还号召“国人”起来斗争，指出在这场斗争中，“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且要永远铲除帝制，“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①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中华革命党先后在江苏、浙江、奉天、广东、湖北、湖南、山东等地，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一九一五年十一月，革命党人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十二月，接着在上海发动肇和兵舰起义，炮击江南制造局，进攻电话局、警察署，震动全国，成为反袁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广大爱国侨胞在反袁逆称帝斗争中，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们集会、通电，在政治上声援国内的反复辟斗争；捐献大笔款项，在经济上支援资产阶级革命派。特别可贵的是，他们自动组织“讨袁敢死先锋队”，开往山东、广东，直接参加反袁斗争，充分表现了侨胞们的爱国热情。

在这场激烈的反复辟斗争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重新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举行“二次革命”，发动讨袁战争，为推倒

^① 以上引文均见《孙中山选集》，上卷。

洪宪帝制作过一定的贡献。但是，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妥协退让越加明显；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严重缺点，除孙中山以外，大多丧失同盟会时代的革命朝气和毅力，走上争名逐利的道路。辛亥革命后，以为大功告成，都想在政坛上捞取一席权位，什么“平均地权”，早已置之脑后。国民党成了官僚政客追逐权位的场所，它的党纲已经完全失去革命的灵魂。“二次革命”除了“讨袁”和“维护约法”之外，提不出任何反映工农切身利益的革命口号。中华革命党虽然主观上想恢复过去的革命精神，但它同样缺乏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相反，却规定按“入党”的迟早，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革命成功以后，这些不同等级的党员，象继承财产一样，分别成为当然的“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和“先进”公民。只有“元勋”公民才能当“国家的头”，“先进”公民则永远贬为庶民。讲资历、论功劳、人为地把革命者分成等级，使少数人享有特权地位，成为新的太上皇，这怎能振作革命精神，怎能不远离群众，怎能不使革命遭致失败。

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另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愈来愈脱离群众，愈来愈失去群众的信任。当时，劳动人民的反复辟斗争，到处烽起，燃遍全国。可是，资产阶级

革命派无视人民的革命力量，继续把自己的军事行动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和单纯的军事冒险之上，根本没有认真地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和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根本没有把分散的、自发的革命势力，统一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因此，袁世凯被推倒了，政权却又落入了帝国主义新的走狗手里。就这样，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不再能够吸引人民群众，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在人民革命力量的冲击下，袁世凯的失败已成定局，“洪宪帝制”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中外反动派，为了使政权不至于落到资产阶级手中，于是抢先行动，发动“倒袁”。经过一段“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斗，政权又重新转移到另一条走狗段祺瑞的手中。

帝国主义碍于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深感袁世凯这条走狗已经没有力量继续维护他们的殖民利益，只好忍痛抛弃，重新换马。他们一方面假意反对帝制，用以摆脱袁世凯；另一方面则积极物色和扶植新的走狗，以与革命势力对抗，尽快地把政权劫收过去，达到维持现状和独霸中国的可耻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的一班新走狗，也就跟着蠕蠕而动。

以梁启超为头目的进步党，原本是袁世凯扶植起来的御用党，在镇压人民革命、帮助袁世凯实现独裁专制的反革命活动中，筹谋划策，卓建汗马功劳。谁知袁世凯一味着眼于利用，不容别人分沾半点权力，当进步党把他送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开始筹备洪宪帝制的时候，就一脚把它踢开。反袁斗争蓬勃兴起以后，梁启超认为这是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当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讨袁战争时，梁启超也混进倒袁队伍。十二月二十三日，蔡锷正式宣告独立，发动“护国”战争。他一面发表通电，限令袁世凯于二十四小时内取消帝制，一面统率“护国军”进攻四川、贵州、广东，形成一定的声势。袁世凯进一步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袁世凯的后院——北洋军阀内部，也随着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而大起分化。

袁家王朝的建立，使得他手下的一批得力打手，失去爬上国家最高统治地位的权利和希望，因此对袁氏称帝一直采取消极态度。他的老友徐世昌，由于不肯俯首称臣而告老“退休”。他的大将段祺瑞害怕拥兵而招来横祸，也主动交出兵权，退隐在京。当革命烈火烧得袁世凯焦头烂额、而不得不请求徐、段出山相助时，他们都学着袁世凯逼迫清帝让权的故伎，婉言相谢，坐

待袁世凯倒台，而后再出山收拾残局。他的另一名大将冯国璋，拥兵自重，坐镇南京，袁氏莫可奈何。护国军起，冯国璋图谋取袁自代，登大总统宝座，因此不顾袁的死活，与护国军暗通声气，示意支持；同时又联合四省将军，密电请求“取消帝制”，这无疑是要袁世凯向他交出政权。难怪袁在看过密电后呆呆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这哀叹，并不表明冯国璋有多大能耐，而是袁世凯借以镇压人民反袁斗争的武力，现在要落空了。“利尽交亡”而成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而无以自拔，这就是袁世凯哀叹之所在，也是一切反动派争权夺利的必然下场。

“无可奈何花落去”。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帝制、反复辟的一片讨贼声中，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吵吵嚷嚷的“洪宪帝制”，仅仅存在八十三天就短命夭折。六月六日，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小丑，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历史是无情的。凡是违抗人民的意志，不顾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妄图倒转历史车轮的人，不管他是什么魔鬼，也不管他多么专横跋扈，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统统回到地狱中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正如

毛主席所说：“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①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5页。

四、愚腐的张勋复辟

洪宪帝制刚刚被打下去，清朝复辟势力又紧接着发动张勋复辟。旧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新的斗争又重新展开，进一步显示了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特别复杂和尖锐。

张勋复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是不足为奇的。斯大林说：“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①袁世凯倒了，但辛亥革命后，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丝毫没有触动。他们的人还在，阶级还在，产生皇帝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消灭。因此，他们总是不会相信自己的失败，“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反抗”。^②第一套班子垮台了，他们还可以拉出第二套班子；“袁皇帝”不行了，还可以把“大清皇帝”请出来。从清朝复辟势力本身来看，经过几年的准备，自认

①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5页。

②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0页。

为有一定的实力，因此，利用了袁世凯死去以后政治混乱的时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急急地发动张勋复辟。这次复辟发生在农历丁巳年，所以又称“丁巳复辟”。

(一) 地主阶级的保皇派

张勋复辟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最愚顽、最腐朽的旧贵族、旧官僚，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反动势力组成。

第一，以张勋、升允为代表的武装复辟势力。

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盗匪出身。早年由于投靠袁世凯、参与镇压义和团而开始发迹；后因“护驾”那拉氏有“功”，得到清朝统治者的赏识，由一个弁兵，经由守备、参将……总兵、翼长的阶梯，到清末官至江南提督。辛亥革命时，驻防南京，“闭门大搜民党”，与江浙革命联军顽抗达一月之久。清王朝为了表彰他的“愚忠”，特授予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高位。但他来不及到任就职，清王朝就被推翻了。“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兵’的原则。”^① 军阀出身的张勋，宁肯暂时屈身于袁世凯之下，也不肯放“弃兵权”，他意识到如果“弃兵

权，安所藉手规匡，复伸其志”。^②因此，他以徐州、兖州为巢穴，利用袁世凯授予的民国宣抚使、都督、巡阅使的合法地位，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为复辟大作准备。在短短的四、五年内，就把一支原仅残存一千多人的反动武装，扩编到拥有六十营、二万多人的雄厚实力。在军队中，灌输封建的“忠君”教育，全部留着辮子，因此有“辮子军”的称号，他也以“辮帅”自命。由于张勋手握重兵，深得“孤臣孽子”的重视，俨然成为清朝复辟集团的中心，被誉为所谓的“武圣”。

升允，蒙古王公贵族，清末曾任陕甘总督。辛亥革命时，组织反动“勤王军”，与陕甘民军对抗。失败以后，只身逃到哈尔滨，投入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奔窜于东北、蒙古、陕甘等广大地区，勾结满蒙王公贵族、旗军残部和反动会道门，组织“勤王军”、“满蒙举事团”等叛乱武装，建立了一个个复辟基地，成为复辟势力在北方的实力人物。

第二，以溥伟、善耆为代表的王公贵族复辟势力。

溥伟(恭亲王)和善耆(肃亲王)是清朝王室的亲贵，是皇族集团中“矢志复辟”^③的死硬派。辛亥革命

① 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11页。

② 陈三立：《张忠武公墓志铭》，《碑传集补》。

③ 《溥伟致升允书》（原件藏历史博物馆）。

时，誓死维护清王朝的权力，反对逊位，反对共和。当无法抵挡革命潮流时，仓皇逃离北京，龟缩到青岛、大连的帝国主义租界内，投靠俄、德、日帝国主义，积极从事复辟活动。他们上通故宫小朝廷，下联徐兖、满蒙复辟势力，外结帝国主义。同时，筹饷购械，昼夜谋划，阴谋复辟。青岛、大连的租界成为复辟阴谋的策源地和投敌卖国的主要基地。

第三，以康有为、劳乃宣为代表的清朝遗老复辟势力。

这是清朝复辟势力中人数最多、散处最广的一支。从成员讲，包括前清政府里的大小官僚，从中央的太傅、大学士、尚书、部臣，一直到地方的总督、巡抚，乃至一般的幕僚、部属。此外，由维新派堕落而为保皇党的“新遗老”，也加入了这一阵营。从地域讲，他们散处潜伏在全国各地，包括上海、青岛、天津、徐州、兖州、南京、北京、南昌、苏州、广州等通都大邑。辛亥革命后，他们丢了饭碗，当官不成，就利用封建文人学士的身分，舞文弄墨，著书立说，恶毒攻击民主共和制度，掀起尊孔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这是一个以封建礼教相维系的、最顽固迂腐的封建“卫道”集团，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黑笔杆。

由资产阶级维新派堕落成为保皇党的康有为，辛

亥革命后变得更加反动,恬不知耻地“以清朝遗老自命”,与复辟派同流合污。他拼凑孔教会,创办《不忍》杂志和《国是报》,不遗余力地制造反革命舆论,成为清朝复辟势力中的得力干将,被誉为所谓的“文圣”,与“武圣”并列。康有为和张勋都是极端仇视革命的家伙,只不过“文圣”是摇唇鼓舌的“文力征伐”者,“武圣”是舞枪弄棒的“武力征伐”者罢了。

总之,民国初年在中国社会上,除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势力以外,又形成了一支囊括一部分军阀官僚、王公贵族、清朝遗老、地主分子、八股文人,乃至反动会道门等等在内的黑暗势力。张勋复辟就是依靠这么一小撮封建“逸民”,作为复辟的社会基础。

张勋复辟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中最反动、最腐朽的政治代表,是最顽固的保皇派。他们为了夺回已失去的政权,在复辟上表现得特别疯狂;又由于他们大多靠《四书》《五经》发家,因此,对孔老二特别崇敬,对复古特别向往。毛主席在分析地主阶级的反动性指出:地主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①又指出:“军阀、

^① 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页。

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①为此，张勋复辟集团表现出特别“忠君”和复古的政治特点，而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封建余孽是一批典型的“好古之徒”，在他们口中，左一个“怀古”、“仿古”，右一个“存古”、“作古”，叫嚷要“行古之道”，“师古之共和”。^②唯古是命，什么都是“古”的好。

他们拜倒在文、武、周公和孔老二脚下，把古代西周奴隶制度描绘成世上绝无仅有的“天堂”，什么君为“民举”，政为“爱民”，“天下为公”。把血淋淋的奴隶主专政，美化为阶级友爱、互相合作的“极乐世界”。他还十分动听地吹捧“半部《论语》治天下，胡诌“贵贱同罪而法平等，集会言论皆自由”，辛亥革命所争之“大者”，“吾中国皆以孔子之经说先得之二千年矣。”^③这就是说，资产阶级为之奋斗的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进步制度，孔老二早在二千年前就已经统入《论语》，并在西周具体实行过。因此，根本用不着搞什么革命，只要倒退回去就行了。这是典型的直接攻击民主共和的复辟

① 毛主席：《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3页。

② 见劳乃宜：《续共和正解》、《致徐菊人书》等篇。

③ 康有为：《孔教会序》。

论调。

康有为高唱崇古复礼，实际上是要复辟最反动、最腐朽的事物。民国废除跪拜礼，康有为大加非难，公开质问：“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①在封建余孽看来，人的双膝是专门生下来为“拜天拜孔”、磕响头用的。真是奴颜卑膝。临时政府下令剪辫子，张勋指棺自矢，“可死不可从”^②，表现出十足的愚顽。民国实行币制改革，改用纸币，复辟派也大加攻击，把它比作阴间的“纸钱”。^③如果说袁世凯尊孔崇洋，把西方的月亮都看得比中国长得圆的话，那么，清朝复辟派则尊孔复古，把古代的铜钱也看得比近代的纸币好使，可谓荒谬透顶，愚腐至极。不仅如此，他们什么也看不顺眼，仇视一切，堕落到为污秽恶浊的妓院、赌场、鬼神辩护，攻击“禁妓馆”有违“人性”，使他们失去寻欢作乐的场所；攻击“禁神诞”鬼神有违“惩恶劝善”，使他们失去“临悚人民”、麻醉人民的工具。^④这些反动透顶的家伙，一天听不到“圣谕纶音”，行不了跪拜之礼，看不见辫子小脚，找不到妓女鬼

① 《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

② 陈三立：《张忠武公墓志铭》，《碑传集补》。

③ 胡思敬：《见通行民国银行纸币书以志慨》，《退庐诗文集》。

④ 康有为：《议院政府无干预民俗说》。

神，就感到简直无法生活下去。

封建余孽戴着“复古”的有色眼镜，把共和国看得漆黑一团，“今不如昔”。攻击共和制度是“异政”、“危道”，是“兽行”，诋毁平权自由是“无父无君之教”。^①就是在一些小问题上，也从不放过，处处表现他们具有“尊君怀旧之义”。辛亥革命前后，封建官僚、遗老为躲避革命锋芒，纷纷隐归故里，建立了不少颀庐败阁，但所取阁名，无不挖空心思，包藏祸心。刘廷琛（原学部副大臣）取名“潜楼”，就隐含“潜究阴阳往复之机，治乱得失之本”的险恶深意，作为“潜究”复辟、镇压革命的场所。胡思敬（原吏部主事）的“退庐”，则含有“天下无道则隐”之意，恶毒攻击革命，妄图以“退庐”为“韬晦”之场，以便有朝一日“徐出而图”。其他如“海藏楼”、“海日楼”、“潜园”、“苍虬阁”等等，无不含有潜伏待发的反革命深意。事实清楚地说明，这不是什么“消闲养老”之场，而是朝夕想吃人的“狼窟虎穴”。这些清王朝的“逸民”，正是潜伏在这些地方向革命发射暗枪黑弹、向革命反扑的。顽儒胡思敬在其所有的反革命诗文中，从不使用民国纪年，照旧书写宣统某年某月某日字样，以表示他的反革命气节。有个同党改名“更民”，他

① 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升允，《敬告天下文》。

大加训斥说，“大清之民，何更之有”。按照这个遗老的“考证”，“更字有服从民国之意”，①是万万不能使用的。这些事例说明，封建余孽都是具有花岗岩脑袋的顽固分子，他们刻骨仇视民主共和，处处表示“忠君不二”，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封建余孽的反动性，集中表现在“保皇”上。为了恢复已失去的“天堂”，纷纷以“复辟”、“雪仇”为职志，以“规复故主”，“奉宣统复位”相号召。一时间，“尊王吾志”、“非复辟不能救中国”的陈词烂调，漫天价响；一支支“勤王军”，扯起黄龙旗，猖獗一时，大有把整个中国一口吞将下去之势。这些家伙满脑子浸透着孔孟之道的毒素，到处哀嚎：“人臣最痛心之事，无过于效忠无地”，②活现了一副奴才的嘴脸；有的公开上书，“大倡尊君”复辟，还顽固表示，即令为此被斥为“淆乱国是，声其罪以暴之天下，亦所不辞”。③真是赤膊上阵，“破釜沉舟”了。为了坚定反革命意志，封建余孽之间互相勾串，书信频传，以“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思恋故主，当每饭不忘”，相互激励。甚至一再嘱咐，“幸努力

① 胡思敬：《劝黄子雅戒酒书》，《退庐笈牍》。

② 章梈：《上陆相国书》，《一山文存》。

③ 刘廷琛：《致徐世昌书》，引自章士钊：《复辟平议》。

加餐”，“愿忍泪加餐”，①以便保存反革命力量，和革命势力较量。反革命的疯狂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列宁在斥责无耻的奴才时说过：“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②这是对奴才面目的最好写照。以张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铁杆保皇派，正是这样的无耻之徒。

(二) 群魔乱舞

张勋为首的复辟集团为了达到清帝复辟的目的，从组织上、思想上、外交上作了大量的复辟准备，妄图和人民作一较量。

集党结社

被辛亥革命冲击得落荒而逃的封建官僚地主，在袁世凯的保护下，很快镇定下来。他们惊魂稍定，就从阴沟里钻出来，招朋引类，互通声气，麇集在封建小朝廷的周围，相继建立各种不同类型的反革命团体，组

① 见胡思敬，《退庐笺牍》、《退庐文集》。

② 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页。

成了一支支反动透顶的复辟党。

最早建立的是以“酒会”为形式的反革命政治集会。一九一二年，蜷缩在上海的清朝遗老，发起“间月一聚或一月再聚”的“五角会”。不久，又约集来自广州、南京、北京、苏州、福州、南昌、四川等地的封建余孽，在上海举行具有全国规模的“一元会”，^①借以集结反革命力量，坚定复辟“意志”。会上，有的恼怒，有的咒骂，有的哀叹，有的哭泣，歇斯底里地发泄他们对民主共和的仇恨。胡思敬后来追忆这次酒会的政治目的说：“今日之乱，古所未有；今日避乱之方，亦古所未闻。诸子怆念故物，缅怀旧京，擅于斯，粥于斯，即当歌哭于斯，使四邻闻之，知中国尚有人在也。”^②可见这实际上是遗老们共同矢志复辟的反革命“结盟会”。他们不仅借以团聚复辟力量，而且还想在社会上扩大反动政治影响，甚至还想赢得帝国主义的重视和支持。

类似的聚会，在青岛、天津、南京、南昌等地也不断举行，或曰“吃饭会”、“聚餐会”，或曰“十老会”、“消寒会”。名目各异，实质相同，都是“怀念清朝”、相与“密谋匡复”的反动聚会之场。

“诗社”和“读经会”是又一种形式的反动政治

^{①②} 胡思敬：《吴中访旧记》，《退庐文集》。

团体。

一九一二年，在上海成立所谓的“超社”，隐有“闻召即走”的反动深意，可见这是专为复辟而建立的反动团体。随后又相继成立“淞社”、“逸社”、“希社”等。在这种“月必一聚”的诗社里，有的多达百数十人。他们“纵饮联吟，荡激哀愤”，^①处处发泄“亡国之恨”。这里仅举《咏雪》一诗，即可概见诗社的反动性。“茫茫一片无昏晓，没尽田园掩尽关；看汝飞扬能几日，朝曦隐隐露西山。”^②这真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反革命诗句，它恶毒诅咒共和国，将民主革命比喻为终必消融的大雪，幻想清王朝东山再起，“重见天日”。

三、五人，十数人相聚的“读经会”，在上海、北京等地不断出现。他们扶老携幼，每周一聚，通过讲经、读经，宣扬孔孟之道，散布“忠、信、诚、敬”的反动毒素，妄图本着孔老二的反动信条，“身体力行”，“字字皆有着落”，^③在中国实现复辟。同时，借以“培溉”复辟的基干力量，以使反革命复辟事业一代代的传下去。

酒会、诗社和读经会，在动员和组织反革命阶级队伍，制造反革命舆论，传播孔孟之道上，有一定的影响。

① 陈三立：《沈敬裕公墓志铭》。

② 胡思敬：《退庐诗集》。

③ 《郑孝胥日记》。

但它的规模较小,人数较少,是分散的、带地域性的,而康有为直接指挥的“孔教会”,则是这一时期最大的复辟党。

一九一二年,康有为在海外致书他的门徒陈焕章等,授意在海外拼凑孔教会。陈焕章立即“四出奔走,联络中外人士”。^①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伙同封建遗老沈曾植、梁鼎芬等,于十月七日在上海山东会馆正式成立孔教会。孔教会以“昌明孔教”为宗旨,妄图恢复孔老二的教主地位,“垂之为圣范,衍之为教宗”,实现“道有一尊,学无异说”^②的反革命目的。

孔教会成立后,立即在地方省、县,甚至大的乡镇设立支会或分会。在孔教会的影响下,“尊孔会”、“崇道会”、“孔道会”、“孔圣会”等乌七八糟的尊孔团体,在全国各地纷纷从地底下摇摆而出。一九一三年九月,孔教会在曲阜召开全国第一次大会。随后推举康有为为总会会长,张勋为曲阜孔教总会事务所名誉会长。文武“二圣”,双双登台,直接控制孔教会,作为清帝复辟的御用工具。孔教会散布全国,网罗了军政各界要人、封建遗老、反动文人和其他社会渣滓。除张勋、康有为

^① 陈焕章:《孔教会追悼姚菊坡先生演说辞》,《宗圣学报》,第二卷,第5册。

^② 《孔教会公呈》,《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1号。

以外，军阀张宗昌、吴佩孚，保皇党分子梁启超，孔老二的“圣裔”孔祥珂、孔令贻等，都是孔教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袁世凯开始想利用孔教会为自己复辟服务，更是大加支持。总之全国的反动分子，大都集聚在孔教会的周围，结成了一个反动而又愚顽的复辟党。

孔教会的成立，也少不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盖沙令、李佳白等，实际上是孔教会的幕后策划者和发起人。盖沙令一踏进中国，就到处发表演说，鼓吹建立“孔教教会”，胡说什么只有大树孔老二的“权威”，只有“尊孔复礼”复辟“大业”才有“所托”，才有希望。在上海，他和沈曾植等复辟分子打得火热，日夕与共，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孔教会能如此迅速地在上海成立，和盖沙令是有密切关系的。^①盖沙令的尊孔主张和言论，被中外反动派捧为“与中国时局有绝大关系”的“重要演说”，“尊孔复礼”是“中国发展必须遵循的路线”。帝国主义在华报纸大肆刊登，美国的宗教侵略组织“尚贤堂”还单印成册，到处散布，为孔教会的建立大造舆论。李佳白是另一个孔教会的幕后“发轫者”。他积极支持陈焕章的拼凑活动，“极端赞成”设立孔教会，甚至“预约”陈焕章先到“尚贤堂”“演说孔教”，扩大影响，作

^① 参见梁凌益：《盖沙令到中国来干什么？》，《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5期。

为孔教会成立的“预备”。于是“孔教会之发轫基于是矣！”^①在盖沙令、李佳白的带头下，其他侵略分子也竞相支持，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有贺长雄（日）、英占租借地威海卫民政专员庄士敦（英）、同善会教士卫礼贤（德），相继列名加入孔教会。卫礼贤还担任青岛孔教分会的会长。英国侵华急先锋李提摩太，不甘落后，专为陈焕章的《孔教论》捧场作序，表示他虽然是个耶稣教徒，“然于孔教之精义，亦莫不乐闻之也。”在孔教会成立会上，帝国主义分子用同一个腔调，鼓吹孔、佛、耶、回各教“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以谋人道之乐利”，^②实现“世界宗教”之“联合”。^③帝国主义鼓吹的“联合”，就是共同勾结起来，对付中国人民革命；他所“谋”的“乐利”，自然是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孔教会成立后，立即被拉入“尚贤堂”，成为“国际教务联合会”的一员。由此可见，孔教会既是张勋复辟集团鼓吹尊孔复古的场所，更是中外反动派互相勾结、共同反对中国新文化的“反动同盟”。孔教会的成立，标志着张勋复辟的组织准

① 陈焕章：《孔教会追悼姚菊坡先生演说辞》，《宗圣学报》，第二卷，第5册。

② 李佳白：《孔教窥见之一斑》，《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刊》。

③ 李提摩太：《孔教论序》，《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刊》。

备,已经大体完成。

尊 孔 反 法

孔教会一经成立,就掀起尊孔反法逆流,向革命势力进行猖狂反扑。

一九一三年,孔教会动员全部虾兵蟹将,发起“定孔教为国教”的反革命活动。陈焕章、梁启超等以孔教总会的名义,向参、众两院上《孔教会请愿书》;张勋发表《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康有为向袁世凯建议,请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①各地尊孔团体、军阀官僚也纷纷抛出黑文,发通电,造舆论,刮起尊孔妖风。大肆吹捧孔老二“道冠百王,功垂万禩”;^②“大哉孔子之道,配天地,本神明,育万物,四通六辟,其道无乎不在。”^③又说什么它象“布、帛、菽、粟,为人生日用之所必需,而不能须臾离者”。^④叫嚷只有定孔教为国教,“世道人心,方有所维系”。^⑤孔教会的这一反革命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失败。可是,他们死不甘

①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②④ 张勋:《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1号。

③ 康有为:《孔教会序》,《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2号。

⑤ 《孔教会请愿书》,《庸言》,第16号。

心，到了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以后，又再度上书，陈焕章危言耸听，胡说什么“孔教若不定为国教，则中国必亡”。^①张勋更纠合一些军阀，多次致电国会，竟扬言如果国会不听从他们的意见，就要解散国会，另组制宪机构。甚至威胁恫吓说：“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暗示要用武力“作最后之解决”。^②一九一七年三月，上海孔教会出面纠合各地尊孔会、社，组织所谓的“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以陈焕章为会长，张勋、康有为等为名誉会长。他们立简章，订宗旨，设分会，动员全国的牛鬼蛇神，制造更大的声势，妄图组织进京请愿团，把孔教定为国教，塞进宪法。^③

与此同时，孔教会还举行大规模的祀孔活动。

一九一三年秋，孔教会在曲阜召开全国第一次大会，来自各地的孔教会分子、封建余孽一千多人，拿着袁世凯发给的半价优待票，来到孔老二的老巢，顶礼膜拜，举行大规模的祀孔典礼。嘟嘟囔囔地说：“人心将死，惟孔教能生之”，叫嚷：“不以国教属先圣，更将以何者为国教？”^④各地孔教会也跟着起哄，北京孔教会在

^① 《孔教会上参众两院请定国教书》，《宗圣学报》，第二卷，第5册。

^② 《张勋等联名争孔教为国教电》，《宗圣学报》，第二卷，第6册。

^③ 《各省公民尊孔会开会纪事》，《宗圣学报》，第二卷，第6册。

^④ 《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9号。

国子监举办“秋丁祀孔”；江苏扬州“尊孔崇道会”，早在是年春天就已举行，参加者大半是“猪尾犹存”的封建余孽，大行三跪九叩首。一九一五年，江苏青浦这么一个小县，也举行规模巨大的“祝圣礼”，礼成后仅是参与和诗者，即达千数百人之多。^①

在祀孔活动中，“武圣”不甘示弱，不仅亲到曲阜磕头祭孔，而且还赤裸裸地炫耀武力，“干矛护法”。^②当时，曲阜的革命群众，伐孔林、捣祭器，夺田产，大造孔府的反。张勋象祖坟被挖，立即“卫之以兵”，并公然下令，不准人民动孔林一木，否则以“死议”论处。^③把孔林、孔庙和孔府特权强行“保护”下来。^④事后，孔老二的家族感激不尽，孔令贻特地发起为张勋建“生祠”，以报孔府“受其庇荫”的“功德”。^⑤事实雄辩地说明，张勋要复辟，必须尊孔，孔老二要成为“圣人”，必须托反动派“庇荫”。两者狼狈为奸，一丘之貉。

在这股尊孔逆流中，清朝复辟势力以孔教会为基地，通过他们的喉舌《不忍》杂志、《孔教会杂志》、《国是报》、《中国学会报》等刊物，散布“反孔亡国”、“尊法亡

① 章棫：《孔宅诗叙》，《一山文存》。

② 《上大总统请尊孔教书》，《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1号。

③ 林紘：《谒孔林记》，《畏庐续集》。

④ 张勋：《松寿老人自叙》。

⑤ 《孔府档案》。

国”等种种反革命谬论。

在“反孔亡国”论里，他们不遗余力地吹捧孔老二，把孔教当国宝，力图证明孔老二是骂不得，反不得的，否则就有亡国亡种的危险。

复辟派鼓吹“孔子之道，博大如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立国大本”，胡说中国“晏然一统，致治二千年”是什么“半部《论语》”的功劳。^① 为了推销反动的、不得人心的“以礼为治，以道为国”的陈货，他们还鼓吹说：“纲常名教，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也。有之则人，无之则兽；崇之则治，蔑之则乱。”^② 把孔教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他们视革命为“洪水猛兽”，攻击民主共和制度是什么“大乱之道”，“有共和一日，则共乱一日”，“乱无止期”。他们对资产阶级革命“锄除富家贵族”、“倒帝者之专制”，恨得要死，指斥这是“犯上作乱”，^③ 是绝对不能答应的。因此，骇人听闻地提出，“弃孔教，国必将亡”，“废孔教，而中国于以永灭，岂不大哀哉。”^④

复辟派在“尊法亡国”论里，大力鼓吹复辟倒退的

① 康有为：《孔教会序》。

② 劳乃宣：《续共和正解》，《桐乡劳先生遗稿》。

③ 康有为：《中国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势》。

④ 康有为：《孔教会序》。

“礼治”，反对前进革新的“法治”。攻击历史上著名的法家子产、商鞅、韩非等推行的法家路线是“危道”。胡说什么“法治低下”，如果实行“法治”就会导致“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其祸倍甚”，^①结果，“其国必不能久存，而垂垂以亡。”^②真是要大难临头，“国将不国”了。他们还恶毒咒骂崇法反儒、统一中国、在我国历史上起过重大进步作用的秦始皇，是什么“专制暴君”；攻击秦始皇“以六经无用，而焚书坑儒”。胡说秦朝的灭亡，是由于实行法治，“不行仁义”的结果。^③因此，他们狂叫：“若此危道，岂可行乎”。^④在康有为之流看来，“非圣无法”，尊法必亡。

清朝复辟派所宣扬的“反孔亡国”论、“尊法亡国”论，是直接为攻击辛亥革命的“糟透论”服务的。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违背了“君臣父子”“统于一尊”的孔孟之道，糟得很！把孔老二从“教主”的宝座上拉下马来，在“至圣”头上动土，糟得很！废除跪拜、停止祭孔、取消读经、禁止蓄辫，更是“罪浮于秦始皇”，当然更是糟得很！一句话，“祖宗之法不可变”，“君臣之义不可忘”；革命有罪，造反无理。这就是他们的反动逻辑。

按照这个逻辑，康有为之流开了一个“起死回生”

①③ 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师欧美而尽弃国粹说》。

②④ 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

的“药方”，药方的名字叫“尊孔火法”。他们大吹大擂，“有孔教乃有中国”，①“人心将死，惟孔教能生之”。又说：“今欲大拯中国，惟有举辛亥以来之新法令尽火之，而还其旧”。②按照这个“药方”要“救国”必须尊孔、必须“火法”。只有尊孔和“火法”才能“复旧”。这个“旧”，就是复辟。用康有为自己的话作注解，那就是“存帝制”，复辟反动的君主专制制度。他说：“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存帝制以统五族，弭乱息争，莫顺于此”。③原来，康有为之流的“尊孔救国”，是为了把“大清”皇帝请回来，在中国永“存帝制”，只有这样，才能“以统五族”“弭乱息争”，才是“莫顺于此”。所谓“以统五族”，就是让封建统治者继续骑在各族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所谓“弭乱息争”，就是镇压人民革命，恢复帝王的“一统天下”。

卖 国 求 荣

张勋复辟集团由于没有掌握中央政权，不可能象袁世凯那样公开和帝国主义来往和签订卖国条约，可是，他们的崇洋卖国活动，在暗地里一天也没有中断

①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② 康有为：《中国还魂说》。

③ 康有为：《共和救国论》。

过。他们深深知道,要想复辟清王朝的统治,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是不行的。同样,帝国主义各国虽然对新走狗袁世凯抱有更大的希望,但对老奴才也没有遗弃,在帝国主义的“侵略经”中,多豢养几个走狗,到时自有新用场,于是紧密勾结,共同筹备演出了一出出的复辟丑剧。其中沙俄、德国、日本帝国主义,是清朝复辟集团所效法的君主立宪国,关系更为密切。溥伟、善耆既是皇亲国戚,又身居租界之中,因此,卖国活动大多通过他们进行。

沙皇俄国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鸦片战争以来,通过支持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辛亥革命以后,它继续支持清朝复辟势力,充当复辟派最大的后台老板,充当“**亚洲的宪兵**”,“**力图用阴谋、金钱和最野蛮的暴力,把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镇压下去。**”^①

一九一二年初,正当升允组织“勤王军”反对辛亥革命而惨遭失败的时候,复辟派把希望寄托在老沙皇身上。在应变计划中提出:当武装勤王一旦败北,即亡命“奔俄”,以便卷土重来,“使志趣大明于世界,亦可为

^①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8页。

满洲生色”。①

升允逃奔东北和库伦以后，即投入老沙皇的怀抱，狼狈为奸，暗订密约。在这个政治交易中，溥伟曾密信指示升允，只要沙俄支持清朝复辟，“尽可许以重酬”，并且授予升允“主持断行”②的全权，放手卖国，充分暴露了清朝复辟集团的卖国本性。

在升允的拍卖下，沙俄答允大力“相助”，③“奉皇上复辟”。④一九一三年七月，沙俄特派参谋到库伦，“邀升允即日赴俄”，“商议”组织以升允为“总理”的“库伦完全政府”，⑤妄图建立由沙皇一手控制的傀儡政权。据升允招供，他还在沙俄支持下，共同制订了各种复辟计划：首先占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然后由“俄、蒙之兵”进逼张家口，升允则率“勤王军”，“东取秦晋，以收京师”。⑥这是一个极其阴险的侵华计划。

沙俄亡华之心不死。一九一九年，沙皇的反动统治被十月革命扫进了垃圾堆，张勋复辟也早已葬入坟墓。可是，沙俄白匪头目谢米诺夫之流仍然和升允紧

① 《郑孝胥日记》壬子正月二十九日。

② 《溥伟致升允书》（原件藏历史博物馆）。

③ 升允：《致宁夏镇马福祥》，《近代史资料》，总三十五期。

④ 见《郑孝胥日记》。

⑤ 《民立报》，一九一三年七月十四日。

⑥ 升允：《致张云亭》，《近代史资料》，总三十五期。

密勾结，签订“彼此协助”、“共同复辟”的反动条约，规定“俄国”借与“清国”二百万元，枪一万五千支；又约定在大乌里、恰克图等处“招练兵队”，阴谋首先在中国“复辟清朝”，然后“助俄”恢复沙皇的反动统治。^①沙皇余孽和清朝复辟派相依为命，至死顽固不化。

德国帝国主义是复辟派投靠的另一主子。溥伟一逃到青岛，即拜会德国驻青岛的所谓总督，请求德皇“相助复辟”。一九一二年秋，德皇的弟弟亨利专程“访问”青岛，当面向溥伟表示：“他的皇兄陛下和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②自此，德国驻华公使、领事经常出没于清朝复辟集团之间。一九一三年，德国耶稣教牧师卫礼贤，担心孔教绝迹，纠合封建遗老在青岛组织“尊孔文社”，“讲求圣人之道”。同时，特建“藏书楼”，收藏孔孟妖书，聘请劳乃宣“主持社事”。^③卫礼贤是通晓汉语的文化大间谍，不仅翻译了《论语》、《孟子》、《易经》在德国出版，后来还抛出《中国魂》黑书，大肆吹捧孔老二。因此，被封建遗老尊为“服膺孔子”、“粹然有儒者气象”的“高僧”。^④就是这个家伙，披着“讲论经义”的外衣，暗地里却在策划复辟。张勋复辟前夕，他

① 见条约文本和《升允致谢米诺夫函》，原件均藏历史博物馆。

②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

③ 劳乃宣，《青岛尊孔文社建藏书楼记》。

④ 劳乃宣，《致潘季孺书》；陈诒重，《劳山歌》。

到处奔跑，准备为复辟筹措经费。在卫礼贤的影响下，劳乃宣积极向废帝宣统提出“联德复清”的建议，劝他去德国留学，向德皇的女儿求婚。企图通过联姻的办法，乞得支持。这些家伙，为了复辟，堕落到甘当“儿皇帝”的可耻地步。

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德国也一再表示“可设法助力”。张勋镇压“二次革命”时，即有德国军人参与进攻南京的军事行动。此后，德国给张勋源源接济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亲日派段祺瑞按照日本的意旨对德绝交，德国为了保持他在中国的利益，更为积极地支持清朝复辟势力。德国公使辛慈在途经徐州归国时，专门拜访张勋，随后即有枪八千多支，炮四尊，从天津运到徐州。德国还一再表示，德华银行的存款，“可假以举大事”。^①他们还相互勾结，订立草约，议定德国“承认帝国新政府（指复辟后的清王朝），新政府成立后，首宜开复中某（德）国交”。^②据记载，张勋复辟时“辫子军”的枪弹，都刻有德国记号；伤兵送往德国医院；德国报纸对张勋复辟“极表赞同”；复辟失败后张勋由德国人陪伴，引入使馆区避难。^③

① 章宗祥：《复辟问题小记》；《金永致张勋书》。

② 《郑孝胥日记》丁巳四月。

③ 上海文艺编译社：《复辟始末记》；翦生：《复辟纪实》。

日本帝国主义则是清朝复辟派“侧望至深，思法至切”的君主立宪国，因此，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而日本正想借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的机会，独霸中国，所以，也积极插手张勋复辟和其他政治势力，蓄意在中国制造混乱局面，借以捞取最大的侵略利益。

先是，日本反动组织黑龙会分子佃信夫、川岛浪速与善耆、升允勾结，在东北组织“宗社党”；一九一六年，日本大财阀大仓喜八郎又向善耆提供一百万日元作为复辟经费，由日本军人操纵训练了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勤王军”。同时，收买蒙古马贼、民族败类巴布扎布的“蒙古军”，策动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日本“声言”，欲拥善耆“王之东三省”。^①并且计划于一九一六年在满蒙首先发动叛乱，然后南下在全国复辟。日本如此卖力支持复辟，反映了日、俄之间对东北的激烈争夺。黑龙会曾经露骨地表示，要“利用这种援助（复辟）之机，把满蒙地区收归日本的势力范围”。^②

一九一三年，日本又鼓动张勋借镇压“二次革命”的机会，南下攻取南京，然后“运动溥伟入南京为库伦

① 察存著：《天津租界的几个寓公及其大概》（未刊稿）。

② 邹念祖译：《张勋与佃信夫》，《近代史资料》，总三十五期。

第二”。^①妄想使南北两支复辟武装合流，成立由日本操纵的“独立国”。一九一六年，佃信夫又出没于张勋公府密室，这个法西斯分子，一时敦促“张勋起义”，表示“寺内首相当会满足阁下的希望，赞成复辟”；一时又凶相毕露地说：“必须事事接受日本的诱导和扶持”，^②就是说，要张勋充当日本的傀儡。张勋当惯了奴才，欣然接受，并马上派升允为“特使”，赴日乞援。升允到达日本后，破格地受到寺内的“接见”。寺内表示，张勋复辟“尽可按计划行事，……如有何需要援助之处，尽可提出”。随即指令日本驻华公使，负责“保护”废帝宣统的“安全”，^③又“协济巨款”，“促吉帅（升允）回国，合力举义”复辟。^④

日本如此支持，奴才不付出代价是不行的。善耆为了报答主子所布施的一百万日元，把东北三省的“土地、山林、牧场、矿山、住宅、水利等”，作为“担保”，^⑤这无异是把东三省全部出卖了。一九一七年初，张勋和那位既是清朝旧臣又是袁世凯好友的徐世昌，派陆宗輿赴日，接洽支持清朝复辟的交换条件。徐世昌答允

① 《熊希龄致叶揆初赵凤昌函》。

②③ 邹念祖译：《张勋与佃信夫》，《近代史资料》，总三十五期。

④ 《胡嗣瑗致冯国璋函》。

⑤ 《借款合同》，见章伯铎译，《日本与宗社党的关系》，《近代史资料》，总三十五期。

在复辟事成后，“愿以兵工厂合办，及军队警察一部分之管理权为酬报”。^①这是无耻的大拍卖，这些条款，实际上是《二十一条》日本未能取得的那部分重大侵略特权。如果成为事实，中国则将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只是由于张勋担心徐世昌争功，而抢走“辅政王”的位置，这次拍卖才未成为事实。

张勋之流经过一番勾串以后，骄横一时。国外，以为“外交无虞”，各国均已疏通。国内，以为“时机已熟”，“赞助有人”。^②因此，急不可待地大演“袍笏登场”的复辟丑剧。

（三）袍笏登场的复辟丑剧

清朝复辟集团的复辟活动，伴随着“二次革命”、讨袁战争和府院之争，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形成三次小小高潮，而其中一九一七年的所谓“丁巳复辟”，可算是达到了顶峰。

一九一二年，清朝复辟势力刚从地底下钻出，溥伟就在青岛召集黑会，妄想通过张勋和升允的复辟武装，在济南发动复辟，恢复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据此，张勋

① 上海文艺编译社，《复辟始末记》。

② 佚名，《复辟真相始末记》。

“密就筹议”，不仅拟定于“癸丑三月初三（一九一三年四月九日）”于“济南起兵”，^①“传檄济南军民勿梗义师”，^②而且与康有为一道“密联诸镇”，^③策动北洋军阀倒戈响应，连冯国璋也被游说得“颇耸动”，^④准备参与联合倒袁。清朝复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可是，复辟阴谋很快被袁世凯侦知，檄文也落到他手中。袁世凯为了确保个人权位和未来的“洪宪帝制”，自然容不得张勋复辟清王朝，于是，立即严加防范，截断济兖铁路以阻“辫子军”北上。“济南复辟”，中途夭折。

事隔两月，“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利用“辫子军”进行镇压，主攻南京。复辟派兴冲冲地以为这是“天假之缘”，再度制订复辟计划，企图借机占领江北，“养精蓄锐”，然后北联冯国璋，南结岑春煊的军阀势力，“倒戈于袁世凯”。升允则在满蒙举兵响应。幻想癸丑复辟阴谋在南京付诸实现。

张勋踌躇满志，倾其精锐，连克清江、扬州等江北重镇。这个鲁莽灭裂而又急于复辟的家伙，杀红了眼，一味“攘地贪功”，妄想使“复辟大业”由他一手实现。

① 温肃：《祭梁文忠公墓文》。

②④ 胡嗣瑗：读《松寿老人自叙》的签注。

③ 康有为：《复大隈侯爵书》。

因此，不等冯国璋的配合，拚死卖命，攻进南京。张勋满以为清朝即将复起，沿途公开打出“两江总督、江淮宣抚使”的“官衔”，“盖用两江总督之印”，使用“宣统”年号。^①在南京，甚而“不悬国旗，红旗但见张字，见人礼节、称谓、局署名称，悉照前制。”^②封建时代的旧制度全部恢复。

升允则以“陕甘总督”的名义，打起“勤王”破旗，勾结黄天教、杨梅教、大乘教等反动会道门，在满蒙发动多次叛乱，积极配合，伺机南下。

但是，张勋的复辟活动遭到南京人民的极力反对，同时，他又一次坠入袁世凯“借刀杀人”的圈套。张勋在前开路，袁世凯在后“节节设防”，等到张勋攻下南京，江北重镇也全被袁世凯“接管”，连老巢兖州也丢掉了。癸丑复辟，完全破产。

张勋的鲁莽败事，气得遗老们破口大骂：“竖子不足与谋”，并且深“恐此军从此不振，不足以图大事矣”。^③可是，这批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顽固分子并不死心，经过三年的精心筹备，到了一九一六年，又乘袁世凯称帝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再度策划复辟。

① 《民立报》一九一三年八月。

② 《赵凤昌致熊希龄函》，《近代史料信札》。

③ 胡思敬：《与刘潜楼书》。

丙辰复辟阴谋的主要内容，是南联冯国璋，北结升允，南北同时发动，共起复辟。当时，复辟派通过早已进入冯国璋幕下、并担任都督府秘书长要职的胡嗣瑗，利用冯、袁之间的矛盾，怂恿冯国璋反对袁氏称帝。洪宪帝制败亡后，张、冯进一步勾结，在日本的吻合下，双方“意见一致”，“决举龙旗复辟”。^①善耆、升允此时已从日本乞得一百万日元经费，训练了一支复辟武装，因此与张勋相约：勤王军一到张家口，张“即借防守京师为名，派兵北上，拥戴宣统复辟。”^②一场阴险的复辟丑剧，就要登场了。

一九一六年五月，升允指使巴布扎布率领“勤王军”一千五百人，打着黄龙旗，从哈尔滨河畔首先举兵叛乱，随即侵入海拉尔，一直打到南满铁路附近的郭家店，威逼张家口。这是一批十足的匪徒，把对民主共和的仇恨，全部倾泻到人民头上。他们白昼行劫，到处骚扰，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招认，“沿途所过，十室九空”，“弄得百姓不得安生”。^③充分表现出没落阶级的腐败和残暴。

① 《郑孝胥日记》。

② 孙毓筠：《复辟阴谋纪实》。

③ 章伯锋译：《日本与宗社党的关系》，《近代史资料》，总三十五期。

丙辰复辟，由于袁世凯迅速倒台，段祺瑞控制了政治局势，使得张勋和冯国璋协同复辟的计划，一时难以实现。同时，日本的对华政策由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转而支持握有实权的段祺瑞，因此，解散由他们训练的勤王军，迫令巴布扎布撤退，用以稳定段祺瑞的反动统治。丙辰复辟，至此失败。

一切反动派都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一九一七年，张勋捞到“府院之争”的有利时机，悍然发动“丁巳复辟”，演出了一场更为卑鄙的复辟丑剧。

袁世凯死去以后，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剧出现。当时，北洋政府内部，纷争不已，都想趁机捞取更大的权力。同时，帝国主义各国为了重新分割世界，正在进行肮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各派军阀狗咬狗的争斗，实质上反映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再争夺。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开始，围绕着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不可开交的争斗。段祺瑞(国务总理)在日本支持下，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总统)在美国支持下，主张“中立”，起而反对。这就是所谓的“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段祺瑞自恃实力雄厚，悍然召开各省督军会议，成立督军团，威逼国会通过宣战案。黎元洪不甘示弱，先发制人，断然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结果，段祺瑞愤而去津，唆使八省督军宣布“独立”，北洋

政府几乎陷于瓦解。

为了“调停”黎、段矛盾，各派政治势力都把目光集中在张勋身上，公推他出面调停。从而给张勋复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

此时此刻的张勋，不仅自己手中掌握有一支二万多人的雄厚武力，而且还利用了袁世凯死去以后的混乱政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召开过四次徐州会议，取得各省军阀对复辟活动的默认，而且被公推为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直隶、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福建、广东十三省“省区联合会”的“盟主”，授予他“便宜行事”的大权。张勋依恃这一政治资本和实力，跃跃欲试，再度想恢复帝制。“府院之争”爆发以后，黎元洪企图“依张自保”，一再电请张勋出面调停；段祺瑞企图借张倒黎，也支持张勋进京。张勋心怀鬼胎，将计就计。掀髯而笑说：“今而后吾之（复辟）计划得实行乎”！^①他既密电黎元洪，支持他罢免段祺瑞；在段祺瑞面前，张勋又置黎元洪于不顾，同意“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在张勋的如意算盘里，只要你支持我出面调停、支持我复辟，空头支票尽可开出去，到时候，宣统一登上龙座，一切问题就不调自解，一切支票也不

^① 许指严，《复辟半月记》。

兑自现了。复辟党内，一片欢呼，以为龙旗一举，马到成功。

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张勋带着复辟派的“重托”，以“调停”的名义，带领五千“辫子军”，得意洋洋地从徐州北上，十四日正式进入北京。

列宁指出：“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① 清朝复辟集团的一切阴谋活动，都是为了一个最后目的，即夺回中央政权。他们曾经说得很明白：“所恃以驭天下者，权也，无权则无国”。^② 一九一二年以来，他们曾为夺回政权，垂死挣扎。现在，复辟派就要夺权了，他们那种对政权馋涎欲滴的疯狂劲和复旧的腐朽性，表演充分，暴露无遗。

张勋一进入北京，清朝复辟集团全部行动起来。敦促即行复辟的函电，一个个向张勋飞来。由郑孝胥代升允起草的《致张勋书》，敦促不要以“调停为事”，要求“即日电布督师复辟，将共和政体一概剷除”。^③ 胡思敬则警告说：既已兴师，就不能“沈机观变”，否则，“大局瓦解，前功尽弃”。^④ 原大学士封建老朽瞿鸿玕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3—304页。

② 《民立报》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③ 《郑孝胥日记》丁巳年。

④ 《致张少轩书》。

等联名电请：“机不可失，事宜迅办”。^①一些附凤攀龙之辈，也极事怂恿，“现值箭在弦上，欲罢不能，……。趁此时机，厉兵秣马，可以定乱为名，收拾人心，借图大计。时不可失，机不可缓！”^②更多的复辟分子涌向北京、天津，直接“赞襄复辟大业”。溥伟早在张勋还未入京以前，专程赶往天津，拜会张勋，商讨复辟事宜；善耆派代表入京，“促其速行举事”。^③封建遗老梁鼎芬、陈曾寿等连夜集议定计，“敦劝”黎元洪退位；刘廷琛、陈宝琛连日与清室内廷议商复辟；梁敦彦奔走于各国公使之间，乞求支持；狗头军师万绳栻更是“朝夕怂恿”，日夜与张勋谋划。

“文圣”、“武圣”，更是劳苦奔波，丑态百出。六月二十八日，京津火车三等客座中，坐着一个剃去胡须，身着布衣的老头，这个从黑暗世界钻出来的人物，好象怕见阳光，不时用大蒲扇遮挡脸膛。旁边还坐着两个陪伴。这个老头一下北京车站，又被四个辫子兵簇拥上了马车，马不停蹄地送到故宫旁边的张勋公馆，这就是应召而来的“康圣人”。随到的是封建遗老沈曾植和王乃澂。康有为在上海一听到张勋北上，禁不住心花

① 许指严：《复辟半月记》。

② 《张震芳雷镇春致张勋函》。

③ 翹生：《复辟纪实》。

怒放，当即“振笔疾书，预草伪诏”十数道，连日“集款数十万”^①，以备复辟之用。他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夸下海口：“一星期内可措国家于磐石之安”。^② 好象地球真的会按照他的意志倒转。“文武二圣”见面后，连连密议，一致同意立即发动复辟，并商讨了各项对策。

在密锣紧鼓中，一场复辟丑剧马上就要登台表演了。

六月三十日晚，张勋、陈宝琛、刘廷琛等，鬼鬼祟祟地窜入皇宫，参加“御前会议”，决定立即复辟。深夜十二点，张勋强迫北京守军大开城门，将三千辫子兵放进城来。皇城内外，布满岗哨，全城马上戒严。

七月一日凌晨，张勋身穿朝珠蟒服，头戴红顶花翎，率领文武大小官员三百多人，跨进神武门，直奔养心殿，按官阶大小，分排跪下，向年仅十三岁的废帝溥仪大行三跪九叩礼。张勋辫子着地，磕着响头，打开《吁请复辟折》，嘟嘟囔囔地说：“非建设巩固帝国，不足以图存，……臣等反复密商，公同盟誓，代表二十二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③ 溥仪按照事前布置表示接受吁请，立即发布由康有为起草的复辟

① 《复辟始末记》。

② 金梁，《近世人物志》。

③ 上海文艺编译社，《复辟始末记》。

诏，宣布从当日起“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叫嚷要“以纲常名教为精神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① 强调用孔孟之道，“克己复礼”，复辟封建的反动统治。

皇帝复位，奴才受禄。在复辟诏和随后发布的伪诏里，宣统大肆封官许爵，授予张勋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高位，掌管政府最高权力；康有为当上弼德院副院长兼太傅（皇帝的老师），赏给头品顶戴，总算实现了二十多年迷恋红顶花翎的梦想。升允授为大学士，刘廷琛、劳乃宣、沈曾植等封建余孽分别任命为议政大臣、阁丞、尚书、侍郎、都御史之类的大小官职。

清朝复辟以后，孔令貽欣喜欲狂。七月三日拍电吹捧：“恭承明诏，日月重光，毅力殊猷，普天同庆。”^② 再度表现出孔家店和帝制复辟的沆瀣关系。他们所讲的“日月重光”，就是反动的君主专制的死灰复燃；他们所讲的“普天同庆”，就是一小撮帝制余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自我陶醉而已。

在复辟妖风笼罩的十二天当中，北京简直成了一座古董陈列所。七月一日，警察将从徐州“捆载北上”的黄龙旗，“挨户送一”，强迫商店民家悬挂。由于住户

① 上海文艺编译社：《复辟始末记》。

② 《孔府档案》。

过多，“不能遍送”，于是，前门、顺治门一带早已倒闭的龙旗店，又应时开设起来，并雇请“画工”“临时画就”，以供急需，“咸利市三倍”，生意兴隆。^①一时间，沿街檐瓦间，绸做的、布制的，长的、短的，新制的、褪色的黄龙旗，象吊孝一样，垂挂全城。一些“希荣求宠”之徒，为了披挂上朝，翻箱倒柜，将翎顶蟒服找了出来。没有者，只好求助于旧货摊，于是，假发辫、红顶花翎成了时令鲜品，求之不得。连用来装殓死尸、原仅值二十元一套的朝服，也被新贵们用一百二十元的高价抢购一空。此外，大批的封建“逸民”，以为“日月重光”，纷纷向北京麇集，以捞取一官半职。据记载，“凡年满六十，在前清曾任二品以上官吏，无不趋踰恐后，匍匐来京，躬诣宫门，恭请圣安，或辗转托人，通刺于南河沿张大臣之邸第。所有招游过市之马车，皆翎顶辉煌，衣冠楚楚，身穿开气亮纱袍者有之，加补服者有之。即东西车站每次抵京之火车，所满载来之客，亦皆须发皓然之老翁。有识者则指于道旁曰：此某尚书也、此某侍郎也、某巡抚也、某关道也、某翰林编修也。彼辈携手下车，扬扬得色。而一时西河沿、打磨厂一带之旅馆客寓，大有在坑满坑，在谷满谷之概，可谓热闹极矣。”^②袍笏登

① 《复辟真相始末记》。

② 同上。

场，魔舞翩跹，真是一幅绝妙的帝制复辟图，也是孔老二鼓吹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革命纲领，在二十世纪的一次疯狂表演。

张勋复辟，猖獗一时。但这绝不表示反动势力的强大，相反，他在本质上是极其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清朝复辟集团疯狂地急于复辟，正是其内心虚弱、害怕人民的表现。张勋是那样地张牙舞爪，但骨子里却处处流露“自觉其孤”，^①活现了没落阶级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真面目。因此，人民一造反，他也就倒了。

^① 胡思敬：《致魏斯逸书》，《退庐笈牍》。

五、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在反复辟的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是主力军，他们在打倒袁世凯以后，再接再厉，连续战斗，在短短的时间内，粉碎了张勋复辟的反动政变。

中国人民反对张勋复辟集团的斗争，早已开始。一九一二年，张勋在南京策动“赣兵”哗变，妄图反对临时政府。江西人民立即在《天铎报》发表文章，严词声讨，及时揭露张勋妄图“死灰复燃”，“再延清祚”的帝制复辟阴谋，指出张勋是复辟“元恶”，号召人民群起而讨之。^① 一九一三年，辫子军的“张”字旗刚在南京打出，江浙人民极为愤慨，纷纷主张“去此人以保共和”，^② 声讨张勋镇压“二次革命”的罪行。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劳乃宣、宋育仁、刘廷琛等帝制复辟余孽，高唱尊君复辟，更是“天下哗然，群起而辟之，以是为谋叛民国之大罪也。”^③ 打击了复辟派的嚣张气

① 翹生：《复辟纪实》。

② 《赵凤昌致熊希龄函》，《近代史料信札》第一〇一册。

③ 黄毅：《袁氏盗国记》。

焰，使得他们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当康有为盛倡尊孔拜教的时候，“南北报纸，无一赞同”。^① 这些都充分说明，清朝复辟集团的丑恶面目，早已为人民所识破，他们的复辟活动也一再遭到人民的抵制，而处于极其孤立的地位。

一九一七年，张勋集团刚一宣布清室复辟，立刻就使自己陷于全国一致坚决声讨的怒火之中。正如当时一家报纸在社论中所说的那样：“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复辟。”^②

在复辟妖雾弥漫的北京城，人民奋起抵制。就在张勋复辟的第一天，《晨钟》、《公言》、《民言》、《真共和》、《新震旦》和《国民公报》等报“一律停刊，表示抗议”。天津等地的报刊，更是公开“破口大骂”复辟罪行。^③ 北京人民在“禁人谈复辟之非，犯者格杀勿论”的白色恐怖下，没有屈服，奋起进行无声的抵抗。从一日开始，纷纷乘车南下，离开北京。据记载，连日来，“火车无不满载”，“凡可行者几无不行”，一、二两日，仅京奉、京汉两路售出的票款，达七十五万元之多，出现了该路自通车以来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就这样，还有很多因买不到车票无法成行者。^④ 表现了中国人民

① 《新青年》，二卷，2号。

②③ 《英文京报》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七月三日。

④ 翊生：《复辟纪实》，许指严：《复辟半月记》。

对张勋复辟的憎恶。北京人民还冒着危险，“拒挂龙旗”。随着全国人民反复辟斗争的兴起，反挂旗的斗争进一步发展，从三日开始，前门一带，不少人“卷藏”不挂。到了六日，则“寂然不见，甚有扯碎弃于当途者”。^①人心的向背，决定了复辟的必然失败。

全国各地的反复辟斗争，方兴未艾。

“湘人愤慨，莫可名状”。^②七月三日，湖南长沙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拥护共和大会，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要求出师讨贼，有人当场断指血书“护法讨贼”四字。当晚，群众又自动集会演说，反对张勋复辟。

广东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多年经营的根据地，张勋复辟的恶耗传来以后，全省“人心激昂”，“上自官长，下至舆夫，无不痛心疾首，表示反对。”民间自动发起“国民哭灵大会”，抗议张勋破坏共和、解散国会的滔天罪行。随后又改为“国民护国后援会”，继续声援反复辟的正义斗争。

上海各界“同仇敌忾”，一致反对复辟。各报连日刊载《普天同愤录》，发表各方面声讨复辟的通电。只有由张勋津贴、康有为主编的《国是报》支持复辟。^③“文武二圣”唱独脚戏，孤独伶仃，多么不得人心。在

^{①②} 许指严：《复辟半月记》。

^③ 《英文京报》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郑孝胥日记》丁巳年。

人民反复辟斗争的鼓舞下，江苏教育会、上海县教育会均于七月一日开会，一致议决“反对复辟”。甚至连一向态度比较软弱的上海商界，也“反对张勋复辟之举，一体悬挂国旗三日，以表拥护共和、尊重民国之决心。”^①

帝制小丑张勋等的家乡江西省，广大人民更是怒火中烧，感到莫大的耻辱，“报馆张目大骂”，^②纷纷谴责帝制复辟的“荒谬”，斥责张勋、万绳栻之流是复辟“祸胎”，奋起把他们的反动家属赶得抱头鼠窜，四处逃亡，给予了他们应有的惩罚。^③

福建人民怒不可遏，“极端反对”复辟。高呼“共起以杀此獠督”张勋，指出清王朝复辟之日，“吾侪小民之末日至矣”。^④深刻地揭露了帝制复辟派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孙中山继续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进行反帝制斗争，并站在斗争的前列。

在这场斗争中，孙中山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态度比较坚决，认识也比较敏锐。袁世凯才死去几天，孙中山就在一次接见记者的谈话中指出，革命没有成功，革命

①③④ 《复辟始末记》。

② 见胡思敬，《退庐笈牍》。

军“未能从此息肩”。随后又不断指出，袁世凯打倒了，可是政权仍操在北洋军阀手里，张勋等帝制余孽仍然逍遥法外，并没有“造成真正共和”，“事实与本愿相违”。因此他警告说：“隐忧未息，国人犹未得高卧也”。^①并坚决表示，如果北洋政府起而捣乱，反对共和，“我便要讨伐他们”，^②“起而锄之”。^③黎、段“府院之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和章太炎多次致电黎元洪，坚决反对起用帝制犯张勋主持调停。严正指出：“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拥护民国与调和不可兼得”，^④坚决主张“严诛遣以惩有罪”，把反对民国的帝制犯张勋、段祺瑞、冯国璋、梁启超等统统杀掉。^⑤孙中山还谆谆告诫黎元洪说，如果起用张勋，势必引狼入室，“解散国会，推翻宪法，使民国有名无实”，结果“叛人秉政，则共和遗民，必无噍类”。^⑥

当正式复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孙中山等更为愤怒，立即会同革命党人和军政各界要人会议，声罪致讨，表示“誓不与共天日”，同时制订兴师北伐、“扫穴犁庭”的反复辟计划，并发表《讨逆宣言》，进一步表示了

①③ 均见《国父全书》。

② 《革理》第七辑。

④⑤ 《国父全书》。

⑥ 《英文京报》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维护民国的决心。七月十日，孙中山、章太炎等因在上海的活动成效不大，于是南下广州，准备在西南筹建护法根据地。孙中山沿途演讲，指出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实质，是主张革命的“新潮流”同主张倒退的“旧潮流”的斗争；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①揭露段祺瑞组织“讨逆军”的阴险目的，指出：反对复辟是假，争夺权力是真；只要“权力在手，又要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②这就把反复辟和反对整个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反帝制和“建设真正之共和国”结合在一起。这种认识，也远比过去深刻。但是，在孙中山身上愈来愈明显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弱点。他把反复辟斗争的希望，寄托在与黎元洪和西南军阀的联合上，因而到处碰壁，一无所成。同时，在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无产阶级即将起而领导革命斗争的时刻，孙中山更为漠视工农大众，看不见劳动人民雄厚的革命力量。结果，反复辟的大权被南北军阀所窃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就干不出什么大的事业来。

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中，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在进行着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这是一场革命和反

① 《孙先生演说词》，《民国日报》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日；《总理全集》第二集。

② 《孙先生演说词》。

动、尊法反孔和尊孔反法的两条路线斗争。这场斗争既是反对康有为之流的尊孔反法，又是批判袁世凯的祭天祀孔。两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另一次声势浩大的儒法大论战。

广大人民大喊大叫，口诛笔伐，痛击康有为之流的复辟谬论，反击复辟思潮的猖狂进攻。伟大的文化革命主将鲁迅英勇战斗在第一线，对“虚君共和”、“尊孔读经”、“保存国粹”等复辟思潮，不断给以迎头痛击，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帝制、反复辟的共同呼声。康有为之流大倡尊孔复辟，建立孔教会，尊孔教为国教等反动言行，当即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尽管孔教之徒既上书、又请愿，吵吵嚷嚷，闹得乌烟瘴气，但以孔教为国教的提案，在人民中间始终通不过。因此复辟派哀叹：“吾人主张根本动摇”，^①给了他当头一棒。

针对康有为的“反孔亡国”论，资产阶级革命派截然对立地回答：反孔是民主革命的需要，中国不是亡于反孔，而是亡于孔教。

“孔子生而吾华衰”，这是革命派的观点。

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和

^① 李时品：《致严复书》，《知类彙立斋日记》。

康有为展开过激烈的论战，揭露了他的保皇面目，批判了尊孔的种种谬论。指出孔老二是反对人民革命、阻挡社会前进的反动“政客”，是“微不足道”的复辟小丑。

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面对复辟派祭天祀孔的妖风和孔教会的挑战，挺身而出，当即写了《驳建立孔教议》一文，痛击康有为之流倡立孔教会的罪行，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近世有倡孔教会者，余窃訾其怪妄”，是一群不识时务的家伙。揭露孔教会的建立，是按照帝国主义愚弄人民的“耶稣、路德之法”，“师其鄙劣”；又是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故伎，“规摹仲舒而为之”。指出董仲舒把孔老二抬上教主的地位，结果败坏了汉朝的政治，“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现在康有为之流又搬出孔老二为教主，立孔教为国教，必然重蹈董仲舒的覆辙，导致“巫道乱法，鬼事干政”。^①破坏辛亥革命所创立的民主政治，使社会大大倒退。有力地说明了真正导致亡国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反孔，恰恰相反，正是尊孔的结果。

资产阶级革命派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孔老二是—切反动统治者的辩护士，是中国社会落后、倒退的祸根，也是帝制复辟的张本，因此，只有“消灭”孔老二，中

① 《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

国才有进步。总之，在这场论战中，鞭挞了孔老二，粉碎了复辟尊孔的神话，维护了资产阶级主张革新、前进的民主革命路线。

针对康有为之流的“尊法亡国”论，革命派又截然对立地公开为“焚书坑儒”拍手叫好，认为这是对复辟派猖狂反扑的必然回敬，好得很！

孙中山、章太炎等以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热情赞扬了历史上有名的法家如商鞅、韩非、李斯、秦始皇等主张变革、主张前进的进步作用，高度评价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法治的功绩。孙中山赞扬秦始皇是“一世之雄”，是了不起的人物，他“并吞六国，统一中原”，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保护了中国先进的文化，为“汉唐之发展昌大”奠定了基础，“收效之广且远也”。^①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业。

一九一四年，章太炎第一次把《秦献记》公之于世。《秦献记》早在一九〇一年即已写成，现在才拿出来正式发表，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为了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回敬康有为之流对秦始皇的恶毒诬蔑和攻击。章太炎热情赞颂秦始皇依靠李斯，废除反动的分封制，实行进步的郡县制，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

① 《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

中央集权的法治的政治主张。章太炎还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更是时代的需要，是对妄图复辟倒退的反动儒生应有的惩罚。当时，反动儒生恶毒攻击秦始皇的进步措施，主张“师古”，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断然下令焚书，“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否则，就无法维护自己的统治，新的社会制度就无法立起来。至于“坑儒”，章太炎回答说：“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即是说，坑儒是由于反动儒生继续捣乱、造谣中伤，“以妖言惑众”造成的结果，不坚决镇压这些反动儒生，就不可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

章太炎的革命言论，狠狠地回击了康有为之流鼓吹“尊法亡国”的谬论，捍卫了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原则，和民主共和的革命路线。章太炎用“尊新王”的进步观点，有力地驳斥了孔老二“法先王”的反动观点，揭露了清朝复辟集团高唱“复古”的帝制复辟阴谋。从历史上为尊当代的“新王”、即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新兴的民主共和政体提供了理论根据。

通过这场思想上的大论战，打击了尊孔复古思潮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宣传和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为政治上粉碎张勋复辟大造了革命舆论。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反孔斗争是

极不彻底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①在斗争中，他们搬不出什么象样的思想武器，用以反对孔孟之道。他们都认识不到中外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勾结和危害，不敢触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统治，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奴化思想和复古思想的文化革命纲领。他们还严重脱离革命的工农大众，把这场激烈的反孔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内，这就决定了它的软弱无力，影响有限，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反对树孔教为国教，但不反对孔教作为一家而存在，听其自由传播，毒害人民，甚至认为“学校瞻礼，事在当行”，^②同意在学校尊孔。辛亥革命后曾经站在反孔斗争前列的章太炎并没有顶住反革命的文化围剿，随着革命的深入终于背叛自己过去的革命立场，走上尊孔读经的道路，“粹然成为儒宗”。反对孔孟之道的历史任务，就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身上。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57页。

② 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

正当革命人民风起云涌反对张勋复辟，把敌人逼进死胡同的时候，曾经积极支持清帝复辟的北洋军阀，感到大势已去，为了窃取反复辟斗争的领导权，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于是，接过“反复辟”的旗号，乘机而起。那个与张勋称兄道弟的冯国璋，在黎元洪被赶下台以后，捷足先登，窃夺了“民国”代理大总统的高位。权力已经到手，就一脚把张勋踢开。七月三、四两日，他连续发布通电，假惺惺地表示反对“张勋叛国”。还以民国的“忠臣”自居，慷慨陈词：“忝膺重寄”，“国存与存”，表示要与民国共存亡，“兴师讨逆”，与张勋决一死战。段祺瑞本来就是利用张勋倒黎，为他重新掌权开辟道路。五日，他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组织“讨逆军”，六日又设国务院办公处，把国务总理的大权重新抓在手里，以免他人染指。他虚张声势，发布什么“讨逆檄文”，还宣誓说：“不能坐视民国之覆亡”，要为“再造民国”而为之“一援”。实际上就是说，不能坐视政权落到革命派手里，他要为此而孤注一掷。各省督军见势不妙，也跟着转变，他们头天还匍匐在溥仪脚下，俯首称臣，“领旨谢恩”，第二天则腔调大变，什么“誓死拥护共和”，“愿以北伐自任”，“誓扫妖孽”。“革命”的词句叫得比谁都响。他们还相继组织什么“北伐队”、“护国军”，自封为“司令”。总之，南北军阀都把自

已打扮成为反复辟的“英雄”，“再造民国”的“功臣”，都想在这场反人民的斗争中，争权逐利，捞取一官半职。

帝国主义碍于人民反帝制斗争的强大威力，看到张勋复辟必然失败，也急速改变政策，转而支持新的走狗段祺瑞。日本连日召见北洋政府驻日公使，否认日本政府支持张勋复辟，授意由冯国璋、段祺瑞组织“强国”的卖国政府，防止人民造反；还送给段祺瑞一百万日元，作为窃夺政权、镇压革命之用。英、美政府也联合起来进行“干涉”，他们害怕复辟引起更大的“动乱”，影响在华的既得利益，因此宁肯抛弃张勋，扶植新的傀儡，维持一个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军阀政权。

为了更快地从张勋手里接收权力，中外反动派紧密勾结，互相配合。九日，帝国主义北京公使团发出照会，要求解散张勋的武装；十一日，段祺瑞统率“讨逆军”围攻北京，腐败的“辫子军”一触即溃，无力招架，“辫帅”张勋只好灰溜溜地钻进荷兰使馆避难，其他复辟分子也纷纷亡命，作鸟兽散。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曾经骄横一世的张勋，在全国人民的猛烈冲击下，立即成为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他所幻想的“万众胪欢”、“龙旗飘扬”的场面没能出现，迎接他的却是人人喊打的革命洪流。结果，身败名裂，

遗臭万年，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十二日，溥仪再度宣布退位。这场复辟丑剧，前后只演了十二天，就寿终正寝，呜呼哀哉了。

“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①这就是张勋之流的必然结局。

辛亥革命后帝制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袁世凯和张勋也连同封建帝制葬入了坟墓。可是我们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仍然感到怵目惊心，发人深省。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公开打着民国的招牌，在新的形式下复辟封建帝制；张勋复辟集团则抛弃任何伪装，赤裸裸地“勤王”复辟。但是这些政治小丑为什么如此嚣张？如此疯狂？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革命没有触动反动统治的根基，他们的人还在，阶级还在，复辟封建帝制的社会阶级基础原封不动。这就说明，在每一次大的革命斗争以后，只要还存在着复辟的社会基础，复辟和反复辟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

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无比强大，可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5页。

是，林彪一类仍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采取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达到最后消灭资产阶级赖以复辟的社会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使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根本问题。

孔孟之道是复辟倒退之道，投降卖国之道，孔老二是一切剥削阶级法权的维护者，是封建王权的化身。袁世凯称帝少不了它，张勋复辟也少不了它，后来的蒋介石、林彪也得求助于它。因此，批判孔孟之道，打倒孔家店，是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场持久的、激烈的硬仗。也是历史上除无产阶级以外，任何别的阶级都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我们必须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尽管袁世凯、张勋复辟表现得如何张牙舞爪，但它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违背人民的意志，真理不在他那边，人民也不在他那边，因此终究逃脱不了彻底覆灭的可耻下场，这是历史的铁一般的定律。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正如毛主席所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

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毛主席又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①让一切复辟小丑去哭泣吧！中国人民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迎着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团结一致，争取更大的胜利！

^① 转引自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辛亥革命后帝制复辟和反复辟斗争

作者 = 刘望龄

页数 = 115

SS号 = 10647786

出版日期 = 1975年10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一、时代在前进，斗争不止息

二、短命的“洪宪帝制”

（一）为帝制开路的专制统一

（二）尊孔、复辟和卖国的二位一体

（三）自导自演的“洪宪帝制”

三、风起云涌的反“洪宪帝制”斗争

（一）反尊孔，批判“孔家店”

（二）反复辟，推倒“洪宪帝制”

四、愚腐的张勋复辟

（一）地主阶级的保皇派

（二）群魔乱舞

（三）袍笏登场的复辟剧

五、历史潮流不可抗拒